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為民主投資：中小企業與臺灣的民主轉型（1977-2000）

Funding for Democracy: Small-Medium Enterprises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Taiwan 1977-2000

施以德

Shih, Yi-Te

指導教授：張佑宗博士

Advisor: Chang, Yu-Tzung, Ph.D.

2021 年 1 月

Jan., 2021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為民主投資：

中小企業與臺灣的民主轉型（1977-2000）

Funding for Democracy: Small-Medium Enterprises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Taiwan 1977-2000

本論文係 施以德 君（學號：R05322004）在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10 年 1 月 27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張佑宗

（簽名）

（指導教授）

陳翠蓮

蔡佳泓

謝 誌



要感謝的貴人很多，首先要感謝的是我的指導老師張佑宗教授，感謝您從我大學時期至今 8 年的照顧。也要感謝我的父母、家人養育、陪伴我至今。

這篇論文講的是台灣民主化的故事，感謝我的 17 位受訪者，礙於學術倫理我不能一一指名，但你們都是台灣人的英雄，也是我能完成這篇論文的貴人。感謝歷史系陳翠蓮教授帶我走進台灣民主運動研究的路，介紹了無數個前輩給我認識，沒有您就沒有這篇論文。感謝楊有騰先生、林正中先生費心介紹重要的受訪者。感謝忠偉學長一直關心我的論文，也在研討會上給我很多的建議、給我很大的鼓勵。感謝郭銘傑老師、蔡佳泓老師給我的珍貴意見。

繕打逐字稿意外的成為本篇論文的重要關卡之一，最終所有的逐字稿成品有 27 萬多字。感謝幫我處理彰化學長部分的學沂、論文互助會的曉昀、札幌研究生互助會的譽真、幫我的宛穎。你們是本篇論文重要的「除蟲師」，謝謝你們的指正與幫忙。

碩士班讀了四年，四年來要感謝的人真的很多。感謝歷史系羅士傑老師在我碩士生涯前兩年提供了無與倫比的學習機會，除了在通識課上擔任助教、還帶我去台灣中部跑田野。謝謝 615 研究室的明宗、昀知、靜一還有清談到凌晨的大家。謝謝珧弘、柏翰、晨心、廉凱、家洋、譯民、偉哲、浚豪，我們都是東亞中心張老師的快樂夥伴，一同走過 ABS 台灣調查，大家也在團體 meeting 裡給予我很重要的鼓勵與意見。

感謝我留學日本北海道一年中遇到的人們，這篇論文有一半是在白雪皚皚的札幌完成的。感謝你們的陪伴，讓我在北國不孤單。謝謝北海道大學法學研究科馬場香織教授、仁碩學長、Hide 桑、朝程、冬睿、盧辰、瑄婷。也感謝月先、柔安在意識報日本分部一同分享異鄉的喜怒哀樂。

最後，要感謝我最重要的伴侶小鹿，這篇論文經你的專業潤飾之後變得更具有可讀性。謝謝你多年來的陪伴，一直鼓勵我完成學位，追尋理想。幾度在我最低潮、最軟爛的時候提醒我、鼓舞我、督促我，有你才有這篇論文的完成。謝謝你無條件的支持，以及對我的愛護。

最後的最後，這篇論文送給所有對台灣民主有理想、有期待的同志們。讓我們一起把台灣打造成最好的國家。



論文題目：為民主投資：中小企業與臺灣的民主轉型（1977-2000）

論文頁數：82 頁

所 組 別：政治系（學號：r05322004）

研 究 生：施以德 指導教授：張佑宗教授

關 鍵 字：台灣民主化、民主運動、民主轉型、中小企業、現代化理論、經濟發展與民主轉型

論文提要內容：

台灣如何民主化？台灣的經濟發展如何促進民主轉型？本文講述 1977 年到 2000 年之間，台灣的中小企業主如何與民主運動的政治菁英相互結合，形成一個強而有力的社會聯盟。這個社會聯盟作為民主運動的底流，成為民主轉型的關鍵之一。

本文提出了兩個研究問題：一、台灣的中小企業是否與民主運動／民進黨的政治菁英結合，形成社會聯盟？二、此社會聯盟是以利益為導向的「利益聯盟」還是以理念為導向的「理念聯盟」？本研究訪談了 17 位民主運動參與者，包括政治人物、中小企業主、以及深度參與的一般民眾。以口述歷史的方法，探討民主運動的經濟資源如何、為何被動員？藉由質性訪談，本文重新建構了台灣民主轉型的另一個故事。證明了台灣的中小企業與民主運動／民進黨結成了一個「理念導向」的社會聯盟。在理論層面，本文補足了民主化理論中「結構論」對於「經濟發展可以促進民主轉型」的關鍵機制。同時，也對於台灣「發展型國家理論」與「民主轉型理論」做了理論上的結合，提出了「威權政體的結構性缺口」的概念。

ABSTRACT

FUNDING FOR DEMOCRACY: SMALL-MEDIUM ENTERPRISES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TAIWAN 1977-2000

by
SHIH, YI-TE

January 2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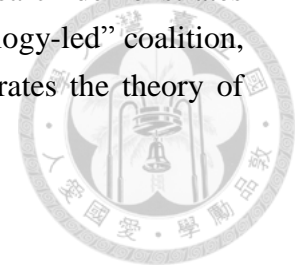


ADVISOR: CHANG, YU-TZUNG, Ph.D.
DEPARTMENT: POLITICAL SCIENCE
MAJOR: COMPARATIVE POLITICS
DEGREE: MASTER OF ARTS
KEY WORDS: DEMOCRATIZATION OF TAIWAN
DEMOCRATIC MOVEMENT
DEMOCRATIC TRANSITION
SMALL-MEDIUM ENTERPRISES
MODERNIZATION THEORY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DEMOCRATIZ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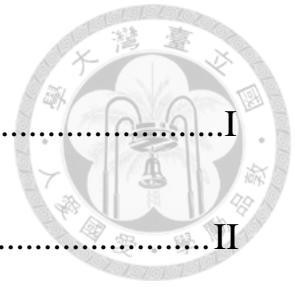
When it comes to explain the occurrence of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previous studies are able to well elucidate the progress and categorize several key actors. Strange as it seems to these researches, the deeper we review the theory, the more we find these researches opaque to answer one of fundamental democratization accounts: "Is economic development capable of catalyzing a country's democratization forwards?" Moreover, a key player seems to be absent from these researches: an economic support group which funds opposition political elites. In the case of Taiwan, the economic support group was constituted by some small-to-medium-sized entrepreneurs. These small-medium enterprises have not only delivered the legend of making Taiwan an economic powerhouse, they have also shaped the path of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progress.

This research tries to lay out these hidden figures, small-to-medium business owners, and scrutinize their influence in politics. Therefore, their motivation, participation, and mobilization in politics is the main focus in the thesis. Accordingly, these business owners are capable of forming a coalition with the opposition political elites, mainly politicians from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However, this research also aims at answering the intrinsic of thi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alition.

Interviewing 17 business owners, politicians and activists,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s opposition politicians and business owners formed a type of “ideology-led” coalition, instead of “patron-client-led” coalition. That the research ameliorates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account for eliciting democratiz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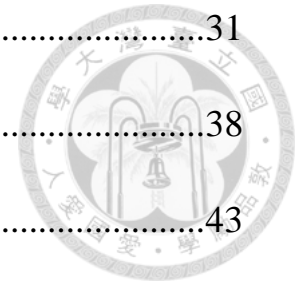


目 錄



口試委員審定書.....	I
謝 誌.....	II
中文摘要.....	III
英文摘要.....	IV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問題意識.....	2
第二節 理論框架.....	5
第三節 文獻回顧.....	10
第四節 研究方法.....	15
第二章 從黨外到民進黨的政商關係史 1950-2020.....	18
第一節 首次政黨輪替以後的政商化走向 2000-2020.....	18
第二節 早期民主運動的政商關係：傳統仕紳參政 1950-1977	19
第三節 從中壢事件到組黨：在風聲鶴唳下為民主投資 1977-	
1986.....	21
第四節 民主轉型期民進黨的政商關係：走上檯面的社會結盟	
1986-2000.....	26
第五節 小結：中小企業社會聯盟的歷史脈絡.....	29
第三章 翻開民主運動的帳本.....	31

第一節 民主運動的支出與收入	31
第二節 民主運動的資源動員框架	38
第三節 小結	43
第四章 為民主投資	45
第一節 為何而捐？台灣中小企業主的民主意識啟蒙	45
第二節 捐錢實況：自發性動員、阻撓與應對	49
第三節 捐給誰？理念還是關係？	52
第四節 政治參與與經濟活動的關係	53
第五節 小結：威權體制鬆動與「結構性缺口」	54
第五章 結論	56
第一節 與民主化理論對話	56
第二節 與發展型國家理論對話	57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研究展望	58
第四節 結論	58
參考文獻	60
附錄：訪談大綱	66



表圖目次



圖 1-1.....	9
圖 1-2.....	16
圖 2-1.....	22
圖 3-1.....	33
表 1-1.....	17
表 3-1.....	31

第一章 緒論



社會科學的研究始終在探究人性。

社會科學，在科學之前，必須是「社會」的。當我拋開沉重的「理論對話」、「因果推論」、「研究方法」，這本碩士論文是從何而起，又要如何往下寫呢？在論文開始之前，我先講個故事吧。

那是 2014 年 3 月第二個禮拜二早上，我還是台大政治系大二學生。社會系大一必修課「社會學甲」在共同大樓的階梯教室上課。作為「外系生」的我坐在教室第一排中間，站在眼前的是社會系范雲老師。那個 1990 年野百合學運總指揮的范雲學姊。這禮拜的主題是「政治社會學」。一上課，老師在投影幕上放出了一段文字然後問全場同學，這段文字出自哪本書？答對的老師要送一本書。」頓了一陣，我慢慢舉起手回答道：「這出自《百年追求》吳乃德老師的序。」我答對了，因為這是最喜歡的一本書，早就讀透了。老師答應下禮拜會送我一本書。

但是到了下禮拜二，我沒有來上課，老師也沒有來上班。因為「318 反黑箱服貿」，台大社會系已經罷課。我也成天待在徐州路社科院法大禮堂，沒時間到公館的校總區關心課業。然而，就在當週日晚間，我又碰見范老師，不是在課堂上，而是氣氛肅殺的中華民國行政院前廣場。范老師拿起了麥克風，以一個社會運動者的身分發表短講。幾小時候，我們又見面了，這次是在哀戚的忠孝東路行政院圍牆外，在場數百人遭遇鎮壓後都全身溼透、有人在發抖、有人在啜泣、有人忙著幫忙傳遞毛巾、水等物資。范老師繼續拿起麥克風，告訴所有運動者，運動並沒有結束，站起來吧，台灣人。讓我們攜手繼續為這片土地努力。

直到學期結束，范老師仍然沒有送我書。至今《百年追求》仍然是我最喜歡的一本書，但那一年在街頭的「真·社會學甲」才是我最真實的民主課。幾年後，運動者從街頭回到書桌，除了感嘆自己的學識淺薄要加倍努力之外，更想回顧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台灣的民主是什麼？是什麼讓我們追求了百年仍心心念念？

《百年追求》第一卷講的是台灣人對抗日本殖民的故事，其中最讓我感動的是陳炳、林獻堂的故事。這些所謂「溫和」的、「右派」的社會運動者，可能無法浪漫如蔣渭水先生一呼百諾、無法論理如連溫卿先生、謝雪紅女士試圖

推動無產革命。但他們不問政治路線、不問家事出身，為台灣第一代社會運動者提供最重要的經濟資源。他們常常在同志最困頓時雪中送炭、甚至對運動上的「政敵」一視同仁地給予幫助。林獻堂一面與日本人周旋，一面要維持霧峰林家的百年基業；陳炳創辦「大東信託」為「糾集台灣人的資金，供台灣人利用」（陳翠蓮，2013）。當然人非完人，尤其「溫和」路線總是會遭受許多批評，也必須和當權者妥協。但是「骯髒事」總得有人做，如同當代社會運動理論講的「資源動員論」一樣，有人出力，也要有人出錢，組織才做得起來，組織做起來社運才做得起來。

同樣的，故事到了《百年追求》第三卷，書裡面寫到這次台灣人因為「人的精神」而獲致勝利，民主終於到來。但是，戰後民主運動的陳炳、林獻堂到哪裡去了？誰來做「骯髒事」？誰為同志雪中送炭？經濟資源這麼重要，誰餵養了這一代的民主運動者？這就是我想探討的問題。也許很市儈、很「現實」，但很重要。運動者回到書桌前，想起了當年范雲老師在投影幕打出的那段文字：

和其他民族相較，臺灣的民主運動並不特別壯烈，不特別曲折，也不特別艱難。不過這卻是我們自己的故事。這些故事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上一代的我們、曾經在同一土地上生存、工作的先人，他們的憧憬、無畏、侷限、和困頓，至今都仍然和我們有著各式各樣的牽連。

（吳乃德，2013）

我的研究問題勾連著我對台灣民主的問題，勾連著我自己的「百年追求」。我的問題是「誰為民主投資？」民主運動必須有市儈的一面、很「現實」的一面，因為這就是「我們自己的故事」，它必須要被寫得真實。回到大二那年的春天，我仍然是一個飢渴的求知者、一個憤怒的運動者，我想，你也還是吧。

接下來，就讓我們回到「社會科學」的口吻，開始我的研究吧。

第一節、問題意識

壹、問題意識

1945年二次大戰終結，剛剛脫離日本帝國異族殖民的台灣人卻很快地又邁入另一個威權統治：國民黨政權。戰後台灣的黨國體制是「雙元威權政體」（陳明通，1995），中央層級的政府機構由國民黨外省菁英掌握，並以「列寧式政黨」牢牢以黨領政，長期凍結憲法、不改選中央民意代表、並以特殊黨部監視社會各界（龔宜君，1998）；而地方層級則是以「恩庇侍從體制」分化台

灣人、以及實行「白色恐怖」的高壓統治。然而，隨著 1971 年蔣政權失去聯合國代表席位，國際情勢漸漸改變，國內則面對越來越大的改革聲浪，蔣經國 1972 年的「青年才俊」政策，開啟了「中華民國台灣化」（若林正丈，2014）的歷程。1977 年的中壢事件、1979 年的美麗島事件標誌著黨外運動的持續擴張政治勢力，直到 1987 年終於解除戒嚴、1992 年國會全面改選，台灣終於達成政治民主化。這是一直以來被稱為「寧靜革命」的台灣民主化的故事：政治的故事。無論從黨外民主運動的角度、或是以國民黨政權黨國體制調整的角度、或是兩者互動妥協的角度，這都「只」是台灣民主化中政治的故事。

與台灣民主同時成長迅速的另一個重要故事，是被稱作「台灣奇蹟」的高速經濟成長的故事。1945 年至 1949 年，台灣尚未由二戰的殘破恢復，馬上又納入了國共內戰的動員體制。內戰結束後，國民黨政權為了在台灣站穩腳步，1950 年開始實施土地改革，逐步穩定台灣經濟，並建立了龐大的公營企業系統（劉進慶，1992）。1950 年代，靠著美援的協助，台灣逐步推動進口替代政策，內銷型輕工業在此打下基礎。1960 年代，台灣開始進入外銷型的「出口導向」政策，而到 1970 年代則為外銷型中小企業蓬勃發展的最高峰，也是經濟成長最快的時期。1980 年代更進一步成功產業轉型，轉向高科技產業。這是台灣人引以為傲的經濟奇蹟的故事，而無論我們以政府政策輔導的「發展型國家」理論(Johnson, 1982; Wade, 1990)來看、或是以「黑手變頭家」（謝國雄，1989）的中小企業興起的故事來看；這都「只」是經濟的故事而已。

戰後台灣政治與經濟的故事都自成一體而感人肺腑，然而本文的提問是：發生在同一時期的兩個故事，有沒有合在一起說的可能？具體來說就是政治民主化與經濟發展之間有沒有因果關係？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現代化理論的提問，然而本文認為這也是理解戰後台灣政經發展的最後一張拼圖：我們並不切確知道政治民主化背後堅實的經濟機制。本文欲重建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政治—經濟機制。

歷來研究台灣民主運動的文獻，總是有一個角色隱隱約約的在扮演這個角色，就連民主運動者在自述中也常常提到他們，那就是台灣的「中小企業」。例如民進黨創黨元老許榮淑曾說：

當年台灣這些提著 007 手提箱的企業家，...（中略）...一看這個法令真的不行，那怎麼辦呢？唯一的辦法就是從法律的起跑點去改革。他們都很聰明，知道法令要改變、時代要改變，一定要有些反對人士、有勇氣的人，他們就捐很多錢，讓那些人無後顧之憂去拼，所以黨外運動都不用煩惱錢。...（中略）...所以台灣的政治奇蹟和經濟奇蹟是結合在一起的，彼此互相連貫，中小企業對早期黨外運動的支持，功勞非常大。（張炎憲，2008:116）

而研究政商關係的學者也這樣描述黨外時期民進黨的政商關係：

... (前略) 在民進黨尚未執政之前，支持民進黨的企業多出於理念上的認同，其中又以中小企業佔絕大多數，由於不倚靠政府特權，因而敢表達理念、放膽支持。旗號鮮明支持民進黨的大型企業集團不多...

(後略) ... (黃宗昊, 2013:59)

針對這段時期中小企業與民主運動的關係，一直以來都沒有系統性的學術著作，但這卻是台灣民主化歷史中最重要的一面。無論在台灣歷史上，或是在社會科學對於「民主化理論」的討論上都有其重要性。

本文的研究目的即是利用質化訪談發掘證據，釐清中小企業與民主運動之間關係。

貳、研究主體、範圍

在此我們必須先界定本研究的研究主體，亦即「中小企業」與「民主運動」。中小企業在法律上有《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來界定，現行條文第二條規定「本標準所稱中小企業，指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一億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二百人之事業。」¹此條例於 1991 年公布施行以後經過多次修正，有些企業會因為法律修改而失去、或獲得「中小企業」的認定。然而本研究並沒有採用這麼嚴謹的法律規定，只要本研究的受訪者「主觀認定」經營的企業是中小企業即可。由於台灣經濟發展的特殊性，本文的研究聚焦在「中小企業（主）」，並無意推論整個台灣中產階級。「中產階級」與「中小企業（主）」並不能直接劃上等號，中小企業主是中產階級，但中產階級並不都是中小企業。謝國雄 (Shieh, 1992) 與陳介玄 (1994) 指出中小企業在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角色，促進社會流動「黑手變頭家」同時也是台灣「經濟奇蹟」的中堅力量。本文認為，中小企業作為經濟發展的主體，創造巨大的經濟產值，在社會上也普遍認知「中小企業」作為一個重要的經濟行為者。因而本研究以「中小企業」來代表「促使台灣經濟發展的中產階級群體」是合理的。

另外，我們必須界定所謂「民主運動」與本研究的時間斷代，即 1977 年至 2000 年。1977 年中壢事件之後「美麗島政團」（新臺灣研究文教基金會，1999）成形，「黨外」的概念取代先前「無黨無派」，正式形成一個「政治菁英團體」。而研究範圍直到 2000 年政黨輪替，則由於「民主運動」作為一個「社會運動」，在這個運動終於「執政」時正式結束。本研究的受訪者普遍都會在無意間以政黨輪替為重大分界點，受訪者明確知道 2000 年以前，是「民主運動／黨外運動＝民進黨」而 2000 年以後就是只有「民進黨」而沒有「民主運動」了。對於民主運動的參與者來說，無論 1986 年組黨、1987 年解除戒嚴、

¹ 民國 109 年 06 月 24 日修正公布。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140003>。查詢日期：2021/01/15。

1992 年國會全面改選、或是 1996 年總統直選，都不是那麼重要的時間斷點，因為「我們還沒贏」。而 2000 年政黨輪替，那是一個「我們終於贏了！（反對運動結束了！）」的時刻。最後，所謂「政治菁英」在本研究所指涉的是「以政治為業」的政治參與者。



第二節 理論框架

學術上可以將經濟發展與民主轉型結合的理論為現代化理論，在現代化理論的經典中，Lipset(1959; 1960)認為政治民主化會隨著工業化、經濟富裕而自然產生。而這個理論/假說引發了後續一連串對於「經濟富裕」－「政治民主化」關聯性的經典辯論。

Preworski, Alvarez, Cheibub, and Limongi (2000)利用大型調查資料分析，發現經濟發展的確對民主有重大影響，但是並非「隨著經濟發展，威權會逐漸轉向民主（民主化）」，而是在政體轉向民主後「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國家，民主不會崩潰（民主鞏固）」，亦即他推翻了現代化理論的民主轉型推論。然而 Boix and Stokes (2003)對 Preworski 等人提出反駁，他們認為十九世紀歐洲的工業化確實扮演著第一波民主化的重要角色。Preworski 等人的研究之所以推翻現代化理論的假設，是因為他們的觀察值集中在二戰後，如果將歷史眼光放長，經濟發展與民主化依然是呈現正相關。另外，研究「威權鞏固」的學者則是質疑現代化理論依然能夠適用於二十一世紀的政治轉型理論嗎？在民主體制的治理成績欠佳、同時威權體制又能滿足經濟發展時，則有可能會落入「現代性的陷阱」，讓威權體制維持穩定，不會轉型成為民主(Foa, 2018)。

晚近的研究共識是：在量化統計上，人均 GDP 超過一定數值的門檻後，沒有出現過民主倒退的案例(Boix, 2011; Preworski, Alvarez, Cheibub, and Limongi, 2000)。這意味著學術上的共識是：**經濟成長程度與民主鞏固也許有關，但與民主轉型的關聯仍待辯論**。Haggard (2016:132)的回顧文章中提到，民主轉型的結構論觀點還是要回到「結構」－「行動者」的因果連結上。當前探究經濟發展與民主轉型的文獻中幾乎都以大型量化資料進行統計推論，如此一來雖能確立一般性的相關推論，但在檢證因果機制上卻碰到困難。以質化方法確認「結構」－「行動者」的因果機制的確是當前對此辯論所缺的研究。

壹、民主化理論中的結構與行動者

因此，本研究以台灣為案例，利用質性訪談探究台灣民主轉型中的經濟動力。參考 Haggard (2016:132)的建議，以下論述台灣民主轉型中的「結構」與「行動者」的關係。



一、結構：邁向現代社會

根據 Preworski, Alvarez, Cheibub, and Limongi (2000:96)的資料，台灣早已達到現代化理論的經濟發展水準²。關於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傾向，葉晉嘉(2012)研究發現 1985 至 1995 年台灣的後物質主義傾向上升，到了 2005 年微幅下降。但 2005 年與 1995 年的後物質主義傾向仍顯著高於 1985 年。顯示 1985 年以後台灣社會逐步邁向後物質主義社會。

二、結構－行動者的關係：形成（階級內的）社會聯盟

本文認為，台灣民主化的故事是經典的現代化理論（結構論）案例：這是一個經濟起飛與政治轉型同時進行、相互作用的故事。這個交互作用的故事，類似於 Moore (1993)的經典之作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對於城市資產階級的研究：資產階級是為了保護財產權而與農民階級結合，形成階級間的「社會聯盟(social coalition)」，進而聯手推動民主。然而，在台灣的歷史脈絡下，對於民主化的學術研究並不常以階級結盟作為分析框架。相較於階級分析，台灣的案例凸顯出的是認同政治、族群政治（王甫昌，2008）。本研究也不欲以「階級結盟」作為基礎，而是參照 Moore 社會聯盟的概念來理解中小企業與民主運動的結合。本文認為，反對運動的政治菁英與中小企業主在階級上皆屬於「中產階級」，只是興起的先後順序不同。因此，這兩個集團的結合，可以說是形成一個「階級內的社會聯盟」。

有關台灣的反對運動與社會勢力結盟，形成社會聯盟的研究，何明修（2000）發現，台灣的環境運動與政治反對運動的結盟，形成「大眾抗爭」的局勢，聯手達到政治轉型以及以及壯大環境運動的目的。而吳介民（2002）的研究則指出 1980 年代台灣各地風起雲湧的「自力救濟運動」與黨外政治勢力的

² Preworski 等人以人均年收入 4115 美元為基準，台灣已於 1979 年達標，卻直至 1990 年代才邁入民主轉型。Preworski 等人甚至以台灣為例說明經濟發展已達標，卻沒有民主化，而是直到威權政府利用國際情勢順勢推動民主改革。這是政治因素，非經濟因素。（Preworski, Alvarez, Cheibub, and Limongi, 2000, 97-98）

結合，黨外政治運動雖然衝破了威權體制，但也吸納了過多的社會運動自主能量，讓公民社會失去活力。但無論是何明修或是吳介民的研究都指出了「政治反對運動與社會勢力結盟」的重要觀點。

據此，我們針對現代化理論與社會聯盟理論，提出本研究的理論框架：台灣的威權政體以發展型國家的經濟政策使經濟高速發展，同時，出口導向的經濟結構使得中小企業大量發展，成為經濟發展的主體。而中小企業在此同時與反對運動的政治菁英結盟，形成社會聯盟，進而推動台灣的民主轉型。因此，本文的第一個研究問題即為：中小企業與民主運動是否有結為「社會聯盟」？

貳、社會聯盟的形成

在此框架下，尚待釐清的問題為：中小企業與反對運動「為何」結盟？本文提出兩種社會聯盟形成的模型：「利益聯盟模型」以及「理念聯盟模型」。並更進一步依照這兩個模型的假設提出了第二個研究問題：此社會聯盟形成的原因為「利益導向」還是「理念導向」？

一、利益聯盟模型

利益聯盟模型的推論是：台灣的中小企業是為了保護（或擴張）利潤，與反對運動的政治菁英結盟，進而推動民主。這與 Moore (1993)的推論一致，認為是物質利益驅使的民主轉型。

針對「中小企業」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勢力，台灣的研究發現中小企業群體處於一個「政治邊緣」但「發展核心」的位置。社會學對於中小企業的研究指出，中小企業在出口導向的經濟政策中以靈活的「事頭」外包網絡概念（謝國雄，1993）、以及協力生產網絡（陳介玄，1994）發展出高度競爭力，成為台灣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但是中小企業面臨飽和的國內市場，加上政策對大企業較優待，使得中小企業的發展受到排擠。而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顯示，在發展型國家、官僚主導的經濟發展期，台灣的內需市場早已被本土大企業或國營事業所壟斷（劉進慶，1992；陳師孟等，1997），產業政策上也優惠這些大企業：對於指定產業減免租稅、銀行對於大資本額企業的融資條件相對較低等。周添城（1989）的研究認為台灣中小企業處於「政商關係的邊緣地帶」，政府給了大多的產業政策優惠都直接對大企業受益，而這些大企業都是與黨國官僚結合的政商集團，中小企業被排除在外。

套用到本研究，利用同樣的邏輯我們可以說明：1970、1980年代新興的經濟力——「中小企業」與黨外運動的結合衝破了黨國體制。這些中小企業基於

經濟動機：想要爭搶國內市場、想要解除政府管制——想要獲利，而支持黨外民主運動做為他們的政治代理人。



二、理念聯盟模型

理念聯盟模型的推論是：台灣中小企業與民主運動的結合是理念的結合，雙方都是為了推動民主而結盟。這呼應了 Lipset (1960) 以及 Inglehart (1977) 的現代化理論，認為是教育與**價值變遷**驅使民主轉型。

現代化理論的奠基者之一 Lipset (1960) 的經典著作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提出了重要的論述：隨著經濟發展而產生一定數量的中產階級，這些中產階級會形成溫和而穩定的力量支持民主制度，進而推進民主轉型。其中，他也特別強調教育對於民主轉型的重要角色：中產階級之所以能成為民主化的中堅力量，是由於他們普遍受過教育，對於自由與公民權利的理解高於其他未受教育的群體。而另一位探討現代化理論的重要學者 Inglehart (1977)，在其著作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提出了「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他認為社會在經歷一定程度的經濟發展以後，會邁入「後物質主義社會」，亦即對於經濟發展、提升物質生活水準的需求滿足後，會產生價值的變遷。人們對於提升經濟發展的需求已經無法滿足，進而追求新的價值觀，例如：人權、平等、環境保護等等。

據此，我們可以推論出理念聯盟模型（現代化理論）對於民主轉型的觀點：經濟發展創造了廣大的中產階級，這群中產階級因為受過教育，而且在物質生活上的需求已經大致滿足，轉而追求「後物質」的價值，其中包括了民主制度的追求、人權的保障，如此的價值變遷，導致了民主轉型。

綜合以上討論，本研究的理論框架可以理解為下圖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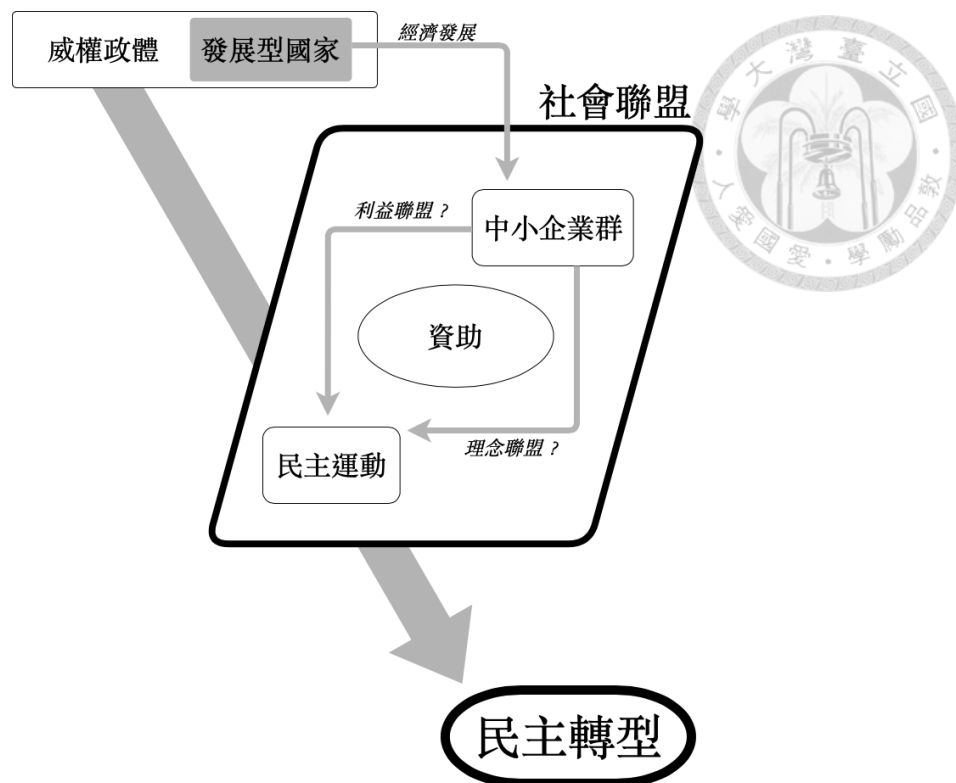


圖 1-1 理論框架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參、小結：研究框架、研究問題

總結以上本節對於理論框架的討論，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具體來說可以整理成為以下兩個：

- 一、中小企業與民主運動政治菁英是否有結盟，成為社會聯盟？
- 二、中小企業與民主運動政治菁英的結盟是「利益聯盟模型」、還是「理念聯盟模型」？

而以量性研究的方法理解，針對第一個研究問題的研究框架如下：

- H：民主運動與中小企業的結合，成為民主轉型的重要關鍵。
- IV：中小企業對民主運動的經濟資助。
- DV：反對運動的成功（政黨輪替）。

本研究第一章為緒論，包括問題意識、理論框架、文獻回顧、研究方法。第二章為從「政商關係」的角度重新理解 1950 年至 2000 年的民主運動，將本研究放入歷史脈絡中，並回答第一個研究問題。第三章為從民主運動政治菁英的角度出發，探討民主運動的「收支狀況」以及他們如何進行資源動員，從中討論第二個研究問題。第四章為從中小企業老闆的角度出發，探討他們如何、以及為何捐錢給民主運動，也再次回答了第二個研究問題。第五章為結論。

第三節 文獻回顧



台灣作為第三波民主轉型的典範之一，自然是許多研究的焦點，也產出了許多本土的學術觀點。本文既與西方民主轉型研究的文獻對話，也期望在台灣本土脈絡下，從台灣民主歷史的觀點與本土經驗研究進行對話。據此，以下文獻整理將分為兩部分。首先回顧民主化研究與台灣的政治轉型，包括結構論與制度論兩個典範。第二部份整理台灣經濟發展的政治觀點，包括產業政策下的政治遺民、市場網絡的政治缺席、政商關係的理想主義三個部分。

壹、民主化研究與台灣的政治轉型

在政治學的學術討論中，自從 Huntington (1991) 提出第三波民主化概念，比較政治學門開始大量投入政權轉型的研究。晚近，Haggard (2016) 將多年來累積有關民主轉型的政治學研究文獻整理成以下架構：

- 一、政體分類：這是最早期民主化研究的問題意識，政治學者看到了政體的轉型，但是政體到底轉型成什麼？
- 二、結構論：這是民主轉型的古典理論，將經濟、社會發展視為自變相，而民主轉型視為依變相。
- 三、制度論：制度論重視民主轉型的過程、歷史、策略互動。特別關注轉型前的政治制度分配（初期結構）、轉型後的制度設計如何影響轉型？
- 四、國際影響論：其他國家、國際組織、境外勢力如何影響轉型？

本文的理論立場較接近結構論的觀點，但本文認為必須結合結構論的立場觀點與制度論的方法實作，才能得出較堅實的因果機制。以下，本節將集中討論結構論與制度論與本文的理論對話。

一、台灣民主化研究的結構論

針對結構論——現代化理論所討論的民主轉型，台灣的研究案例卻沒有特別凸顯出中產階級的角色。甚至在 Preworski, Alvarez, Cheibub, and Limongi (2000:96) 的研究裡，台灣的經濟結構在達到一定標準時，仍然沒有實現民主化，是結構論預測失敗（延後）的案例。相較於結構論，台灣的民主轉型則是更多著墨於族群政治（王甫昌，2008）、政治菁英互動（Cheng, 1989）、或國際影響論（若林正丈，2014）。

對於台灣的中產階級在民主轉型的角色，蕭新煌 (Hsiao,1993; 1999; 2006) 一系列的研究首先梳理出台灣中產階級形成，與東亞各國比較。鄭敦仁 (Cheng,1989)對台灣民主化的先行研究也曾說明了黨國威權與自由派中產階級的衝突。而吳乃德、林佳龍 (1990) 的研究利用了調查資料認為中產階級是一個異質性很高的群體，在政治態度上「省籍」仍然比「階級」有說服力。以上的早期研究都沒有直接碰觸「中產階級興起導致民主轉型」，而是描述性、比較性的初步研究。晚近，蕭亞譚 (2009) 則以扶輪社為例研究台灣中產階級的組織與文化，並側面推論民主化與中產階級的關係，他並沒有直接以質性訪談證明扶輪社與民主運動的直接關聯。最後，有關階級投票的理論，胡克威 (2001) 認為在台灣的民主轉型中，階級投票是一個很重要的變項，他用調查研究發現中產階級（控制者階級、與自營受雇者）在民主化階段普遍支持反對黨，但到了民主鞏固期，控制者階級轉向泛藍，而自由受雇者則維持泛綠。以上針對台灣中產階級與民主轉型的討論，主要有幾個尚未解決的問題：第一，中產階級與民主運動的直接關係不明。第二，如果中產階級支持民主運動，那麼他們的「動機」、「機制」是什麼？

二、制度論

民主轉型的制度論研究首推 O'Donnell & Schmitter (1986)的經典研究，他們首先提出統治集團的開明派、統治集團的保守派、反對勢力的溫和派、反對勢力的激進派，此四派的互動與民主轉型的關係。而鄭敦仁 (Cheng,1989)對台灣民主化過程的經典研究則闡明了威權當局與民主運動細膩的策略互動。後續例如陳明通、林繼文 (1998)、林佳龍 (1998) 都以選舉為中心，探討台灣威權當局所舉辦的選舉與民主轉型的關係，而朱雲漢 (1998) 則以國民黨的雙重轉型為中心，探討威權當局如何在民主化過程中鞏固地位。然而就如同吳乃德 (2000) 對民主化研究過程論的批評一樣，制度論的研究通常太菁英取向，但事實上無論威權當局、還是民主運動都有自己的「群眾」。上層菁英的互動固然重要，本文所探討的是「反對運動與中小企業的關係」，本文認為上層菁英需要群眾，包括出錢的（資助）與出力的（動員）。本文認同制度論的方法取向：歷史、過程是重要的，而這些歷史條件（結構）是創造新制度行動者重要限制。本文所搜尋的「行動者」將不限於政治菁英，這避免了制度論的菁英取向。

貳、台灣的經濟發展與政治

本文的理論建構需要與台灣經濟發展的理論進行對話，第一個層面是針對「發展型國家」的理論批判。本文認為發展型國家的國家機器無意間創造出了

一批自己無法控制的政治缺口，也就是中小企業。第二個層面是要補充台灣中小企業研究的「政治缺席」。歷來以「中小企業群體」為研究對象的社會科學研究，往往研究其「經濟活動」或「社會活動」，往往忽略其政治活動的面向，而本文認為中小企業的政治活動恰恰可以作為台灣民主轉型研究的重要一塊拼圖。

關於台灣經濟發展的解釋，主要典範有兩個。第一，「發展型國家理論」如 Robert Wade (1990)、瞿宛文 (2017) 對台灣的個案研究；或是比較研究如 Stephan Haggard (1990)、Peter Evans (1995) 等人。他們重視經濟發展中國家帶領的角色，認為產業政策、管制金融是經濟發展的主要機制。而另一個典範稱之為「社會中心論」，這一派學者反對發展型國家理論中過度重視國家的作用，他們認為社會網絡、文化因素才是台灣經濟發展的動力。例如 Hamilton and Kao (1987) 認為傳統文化的家庭階序是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社會制度，而陳介玄 (1994)、謝國雄 (1993) 則認為中小企業靈活的協力生產網絡是台灣經濟繁榮的關鍵。

對此辯論，王振寰等 (2017) 的理論回顧文章認為，台灣的發展型國家概念應該要回到 Evans (1995) 提出的「鑲嵌自主性」的概念：到底有哪些政策／產業是跟社會鑲嵌在一起的？又是如何鑲嵌的？國家主導的產業政策自然重要，但社會因素也同樣扮演重要角色。他以四個概念解析國家與經濟發展「鑲嵌」在一起的不同面向：產業政策、市場網絡、政商關係、科技創新。本文同意王振寰等人的主張，認為發展型國家在台灣的脈絡下需要重新仔細檢驗，以下將分別從：產業政策下的政治缺口、市場網絡的政治缺席、以及政商關係的理想主義三個角度進行理論回顧。

一、產業政策下的政治缺口

對於台灣經濟發展的產業政策，存在兩種南轅北轍的學術觀點，第一種是「發展型國家」、第二種是「黨國資本主義」。第一種強調政府干預對經濟發展的有效性、第二種則嚴厲批評產業政策扭曲了台灣經濟發展。然而本文認為無論發展型國家或黨國資本主義都無法很好回應中小企業的生成，以及後續中小企業的政治行動。

(一) 發展型國家理論

有關台灣的發展型國家，鄭敦仁 (Cheng, 2001) 完整敘述了台灣戰後經建政策的變遷及其作用，指出 1960 年代由進口替轉變為出口導向政策為最關鍵的政策轉向，而事實上這些政策的落實也都帶動了台灣經濟的發展。Greene (2008)

考察台灣戰後科技政策，他認為 1960 年代後期開始留美人才第一批回流，回應世界石油危機，科技政策首次發揮作用，帶動台灣首次產業升級，重化工業得以發展。而其後成立工業技術研究院，及結合清大、交大的科技人才成立新竹科學園區，帶動產業高科技升級則是科技政策的最大成就，台灣成為全球筆電生產、半導體業的重鎮。然而，這些研究產業政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卻無法回應為何在「產業政策規畫之外」的眾多中小企業仍然活耀，而且仍是台灣經濟的主力？根據王振寰（2010）對於台灣專利種類的研究發現，以中小企業為主的機械、製造業仍是台灣產業創新的主力之一。中小企業的故事，一直都在政府的產業政策之外，產業政策的成功案例並不適用於他們。

另外，瞿宛文（2017）則強調科技官僚、經濟建設體制的功用。他認為台灣經建體制的成功，是建立在國民政府南京時期不斷試誤的結果。抗戰期間所培養的一批優秀官僚，並沒有因為曾經待過所謂「附匪機關」的「資源委員會」而被整肅，蔣氏政權反而重用這些資委會的前官僚。這些官僚自成一體，對政策的制定、執行有很大的自主性，他們用心積極的要實現中國現代化的理想，而事實上也推行了許多具有遠見的經濟政策。瞿宛文認為這是由於民族主義的救國情操，加上自主性夠強的官僚體制所可以達成的效果。但顯然這些「救國的儒官」具有遠見的經濟政策也不包含中小企業。陳介玄（1994）認為政府對中小企業的政策是「包容式行政」，亦即威權政府基本上不太在意中小企業的發展，讓任他們自由發展。而周添城、林志誠（1999）則認為威權政府的中小企業輔導政策一直沒有效果，政策總是追不上世界經濟的迅速變化腳步。

本文認為，發展型國家理論所提供的台灣經濟史故事，並沒有寫到中小企業與民主轉型。本文所提供的解釋可以補完這一塊拼圖：威權國家搭配產業政策可以創造經濟發展，但在不預期的情況下「長出」了一大群不受政策指揮的中小企業，這些中小企業在經濟上是發展主力，卻在政治上發揮推進台灣民主化的動力。這就是「發展型國家」的政治缺口。

（二）黨國資本主義

1991 年，台灣的國會全面改選前一年、解嚴後四年，經濟學界針對民主化至當時的情況寫成《解構黨國資本主義》一書，開啟了這個討論。陳師孟等（1997）提出威權時期國民黨政權的國營企業過大、黨營企業與民爭利，壓縮台灣自由市場空間，而積極倡導國營企業民營化。基本上早期以經濟學者為組成主體的「澄社」大力倡導國營事業民營化，而在李登輝第二任期時，國營企業積極民營化的結果就變成創造巨大政商集團，黑金政治橫行。朱雲漢（1989）研究發現國民黨威權統治在地方政治的邏輯是以「聯合壟斷」的方式維持與地方派系的恩庇侍從關係。其中「四大特許」行業、甚至非法行業都是

由地方派系所掌控，國民黨政府是以政治邏輯刻意拉攏這些本土精英，並非依照發展經濟的邏輯。陳明通（1995）進一步確認全台灣有 90% 以上的地方派系擁有至少一項地方聯合壟斷事業，其中以客運業、地方信用合作社為最大宗的事業。王振寰（1996）則發現在民主轉型期，利用選舉動員、以及政治菁英激烈的內鬥，本土大企業迅速與國民黨當權的政府結合，使得財團的力量深入政治的核心。Field (2002) 則研究國民黨的財務來源，威權時期以其龐大的黨營事業系統、配合退輔會榮民群體的壟斷事業，創造驚人的營收，甚至一度是全世界最有錢的政黨。

這些「國民黨有限公司 (KMT Inc.)」(Field, 2002) 政商關係的研究，並無法告訴我們中小企業與政治的關係，甚至低估了崛起經濟力與民主運動結合的可能性：既然國民黨威權當局結合資本家的黨國資本主義能夠壟斷台灣經濟，那麼民主轉型又如何可能？這些中小企業又哪裡來的資本／勇氣可以突破黨國壟斷，為民主運動投資？瞿宛文（2017）也指出，「黨國資本主義」是跟著民主反對運動一起論述出來的，這其中會包含不少政治目的。本文認為，國民黨威權政府扶植國營事業與黨營事業，是為了拉攏外省人菁英群體；而為了滿足島內的內需，同時也必須要扶植本土大企業。然而，為了不讓本土大企業得以威脅到統治集團，當權者必須要刻意與他們保持距離。最後，中小企業的發展則是意料之外的展開。威權政府並沒有鼓勵中小企業發展，而是以既不阻擾又不扶持的態度，搭配優惠的出口稅率、良好的基礎建設與上游原料來源，意外的成為「隱形冠軍」。「黨國資本主義」並沒有那麼牢不可破，中小企業再次成為這個觀點下的政治缺口。

二、市場網絡的政治缺席

台灣經濟發展的「社會中心論」主要是由經濟社會學家所建構的。他們不滿發展型國家理論的國家中心取向，主張以「中觀」或微觀的分析層次來理解台灣的經濟發展。Hamilton & Kao (1987) 認為傳統家庭與社會信任是中小企業發展的制度基礎，謝國雄（1989；1991；1992）則以深入的田野調查發現中小企業是由一群具有企業家精神的「頭家」（老闆）主導，而且促進台灣的階級流動。陳介玄（1994）則發現中小企業靈活的社會網絡可以吸引資金、而且可以傳播技術，形成一個「協力生產網絡」。

這些社會學家田野式的深度訪查解開了許多台灣經濟發展的「中小企業之謎」，然而他們卻沒有告訴我們這些活生生的「頭家」的政治生活為何？既然中小企業不靠政府，靠自己，那麼中小企業對政治的看法會是什麼？

三、政商關係的理想主義

台灣歷來政商關係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上文所提及的「國民黨有限公司 (KMT Inc.)」(Field,2002)相關的研究，例如王振寰（1996）、朱雲漢（1989）、張鐵志（2008）等人的文章。雖然早在 1991 年民主運動參與者艾琳達（1997:169-216）就曾提出民進黨的資產階級化的警告，但直到 2000 年代後期「扁案」發生後，學界才注意到民進黨政商關係的重要性。其中主要觀察都集中在政黨輪替後總統陳水扁個人化的政商網絡，嚴重腐蝕台灣的民主品質（黃宗昊，2013）。我們甚至不知道當國民黨急速轉型成「國民黨有限公司」的 1990 年代，民進黨是如何應對的，遑論 1986 年建黨前的政商關係。我們似乎對於建黨前的民主運動有一種「政商關係的理想主義」的想像。

然而，黨外時期的政商關係之所以重要不只在歷史學上有意義，對於本土政治科學來說，有兩方面的重要性。第一，闡明黨外時期民主運動與新興經濟力的關聯，我們就能更完整認識台灣民主化的全貌，以個案研究的學術意義來說，能對民主化研究帶來啟發。第二，目前對於民進黨建黨的研究仍集中於口述史（陳儀深，2013）、政治菁英（陳信傑，2000）、群眾運動（何孟樺，2016）等方面，對於台灣兩大黨其中之一的民進黨的創立，社會科學的論述仍不夠完整。政黨的創立具有歷史意義，也具有理論意義，例如 John Aldrich (1995)的經典著作就以理性選擇理論說明美國政黨／政黨政治的起源。而對於威權時期的台灣，創立反對黨在民主化研究上有重要理論意義。因此，我們必須理解早期政商關係與民進黨創黨的關係。

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口述訪談為主，歷史文獻資料為輔進行研究。口述訪談的執行時間為 2019 年 8 月至 9 月，成功訪談了 17 位受訪者。每位受訪者均至少拜訪 1 次、其中必包含 1 次超過 1 小時的深度訪談。2019 年時平均年齡為 70 歲，17 位皆為男性。抽樣方法採滾雪球法，引介者有陳翠蓮教授、受訪者 P3、受訪者 P3 配偶、張佑宗教授、楊有騰先生與林正中先生、受訪者 S3、以及研究者自行接觸。詳細滾雪球抽樣的情形如下圖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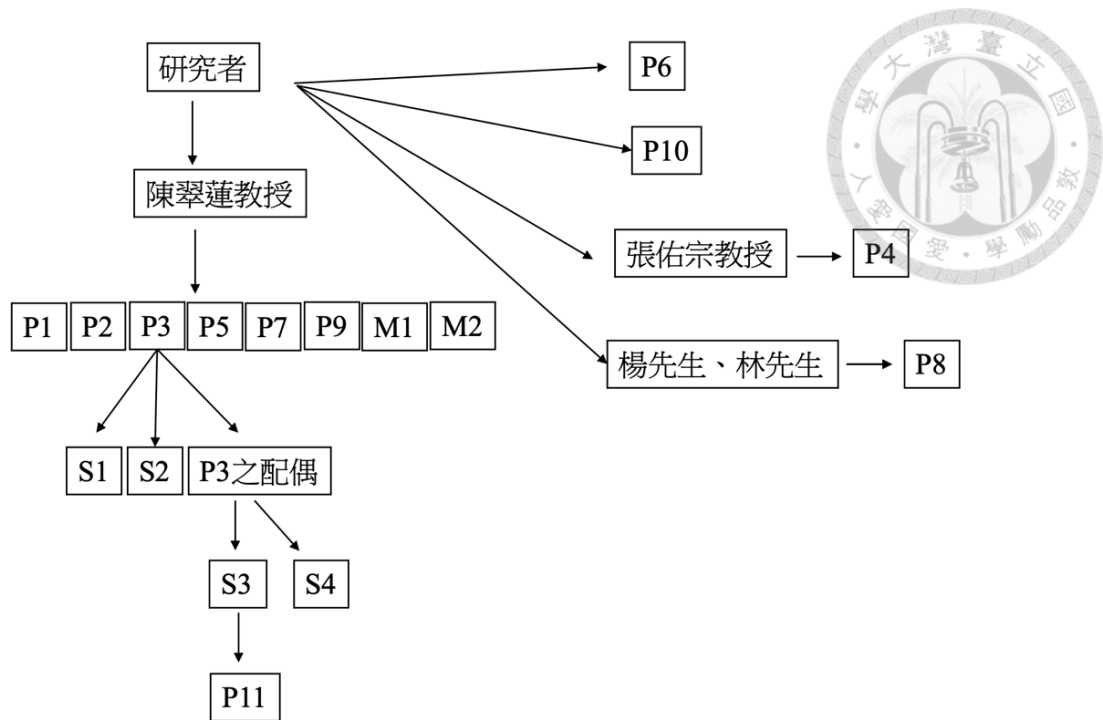


圖 1-2 滾雪球抽樣情形

資料來源：作者訪談。

訪談形式為「半結構式訪談」，研究者會於聯絡過程中給予受訪者訪談大綱，大綱列有約 10 左右的開放式問題。訪談時大致依照題綱進行，但不受題綱限制。每位受訪者的訪談大綱皆有些微差異，詳細如附錄。17 次深度訪談中有 15 位同意錄音，並製作逐字稿，剩餘 2 位則是依據訪談筆記製作訪談紀錄。而研究者在接觸過程中有製作田野筆記 1 次。

依照何孟樺（2016）的口述歷史訪談，對於黨外運動參與者分成以下幾類：政治菁英、黨外新生代、基層組織者、深度參與者、群眾。他認為過去口述訪談僅止於前二項，缺乏對於基層組織者以下的理解。本文欲探究民主運動的政商網絡，因而必須包含從政治菁英到深度參與者的理解。依照何孟樺的分類，本研究訪談了政治菁英 7 名、黨外新生代 3 名、基層組織者 1 名、深度參與者 2 名、群眾 4 名。以地理分佈來說，主要集中於北部、中部。民進黨成立以後的黨內派系分佈則是平均各派系皆有受訪者。詳細受訪者資料如下表 1-1。

本研究透過口述訪談，重建當時民主運動之中關鍵而又細微的財務支持者網絡。選擇口述歷史訪談的理由在於民主運動的政商網絡並沒有既有研究資料，需要透過一手訪談取得。而歷史文獻資料可提供相關線索，黨外雜誌、黨外歷史文件等會作為研究輔助。

表1-1 受訪者資料

類別：政治人物

編號	受訪時間	性別	出生年	根據地	經歷	引介者
P1	2019/8/4	男	1949	南投	全面改選後立委、縣市長	陳翠蓮
P2	2019/8/6	男	1960	無	立委助理、民進黨副秘書長	陳翠蓮
P3	2019/8/9	男	1941	彰化	美麗島雜誌社務委員、政治受難者	陳翠蓮
P4	2019/8/8	男	1944	宜蘭	增額立委、全面改選後國大、立委	張佑宗、研究者
P5	2019/8/19	男	1953	無	多家黨外雜誌編輯、編聯會創始者之一	陳翠蓮
P6	2019/8/20	男	1948	宜蘭	省議員、縣市長	研究者
P7	2019/8/30	男	1938	台北市	台北市議員、增額立委、全面改選後國大、監委	陳翠蓮
P8	2019/8/31	男	1950	台北市	台北市議員、增額立委、全面改選後立委、縣市長	楊有騰、林正中
P9	2019/9/11	男	1947	無特定	黨外雜誌編輯、工運領袖、全面改選後立委	陳翠蓮
P10	2019/9/16	男	1951	無特定	編聯會會長、增額國大、立委、全面改選後立委	研究者
P11	2019/9/18	男	1938	彰化	政治受難者、民進黨主席、全面改選後立委	S3

類別：企業主

編號	受訪時間	性別	出生年	根據地	經歷	引介者
S1	2019/8/16	男	1944	彰化	航運業公司董事長	P3
S2	2019/8/26	男	1939	彰化	橡膠公司董事長	P3
S3	2019/8/29	男	1959	彰化	小五金公司董事長	P3、P3配偶
S4	2019/8/29	男	1962	彰化	汽車改裝零件公司董事長	P3、P3配偶

類別：參與者

編號	受訪時間	性別	出生年	根據地	經歷	引介者
M1	2019/9/16	男	1954	無	書報社經理	陳翠蓮
M2	2019/9/22	男	1960	無	多家黨外雜誌美編、民進黨全職員工	陳翠蓮

資料來源：作者訪談

第二章 從黨外到民進黨的政商關係史



1950-2020

本研究將黨外民主運動／民進黨的政商關係區分為四個時期。首先，以 1960 年自由中國、中國民主黨事件前後為第一時期；第二時期是 1979 年美麗島事件前後以黨外雜誌為核心的組織化過程；第三時期是 1986 年組黨後，與本土中小企業的結盟走上檯面的過程；第四時期則為 2000 年政黨輪替後積極吸附本土大財團的政商化走向。雖然本研究的重心應為第二至第三時期 1977 年至 2000 年，但本章則意圖從「通史」的角度對民主運動的歷史重新書寫，梳理整個台灣民主運動的「政商關係史」以圖通盤了解民主運動／民進黨隱晦的政商關係。

本章分析的資料為作者所進行的訪談、以及民主運動人士的訪談錄、回憶錄等等。本章將先從當今 2020 年民進黨執政所面臨的困境開始，提出民進黨的政商關係問題，接著再回到歷史：1950 年代一直到 1990 年代，探究民主運動與民進黨的政商關係史。

第一節 首次政黨輪替以後的政商化走向

2000-2020

故事由現在往前倒推著說，我們都很好奇，民進黨是如何成為今天的民進黨的？2016 年，總統蔡英文意氣風發的站在舞台上，跟所有支持者道謝，迎接民進黨成功二次執政，呼籲全黨要「謙卑、謙卑、再謙卑」，並「感謝台灣人民帶著民進黨走出廢墟，重返執政」。街頭起家的民進黨在台灣政治史中起起伏伏，在 2016 年總統立委選舉中取得大勝利。然而，全面執政的民進黨政府不到任期一半，2017 年，馬上面臨《勞基法》修正案與民間團體嚴重撕破臉。社運界對此次民進黨修法最大的批判就是這是一個「利資修法」，而民進黨政府最大的論述就是要照顧廣大中小企業，讓台灣的各種產業具有勞資協議的彈性。2019 年，民進黨經歷了 2018 年地方選舉的慘敗，為了挽回頹勢，蔡政府

推動《工廠管理輔導法》，試圖解決中小企業「農地工廠」違法營業的問題。同樣地，再次遭受民間社團反彈。

時間往前到民進黨第一次執政。2006年，陳水扁總統身陷弊案泥淖中，隨著時間越滾越大，民進黨也陷入深層的自我懷疑與疑懼。2008年，謝長廷、蘇貞昌領導的民進黨輸了總統立委選舉，民進黨陷入創黨以來最大挫折。事後，陶儀芬、張珈健（2008）認為民進黨執政時期2004年至2008年，過度地以商領政，而且總統個人在經濟自由化上握有過大權力。黃宗昊（2013）則提出了扁政府執政的個人化政商網絡缺乏制度監督。政商關係的「法制化」、與「正常化」是台灣民主化之後一直無法處理的問題。

我們納悶，那個2016年從蔡英文總統口中說出的「從廢墟中走出來的民進黨」或2000年陳水扁口中的「街頭起家的民進黨」是怎麼跟所謂「中小企業」或「資本家」連結在一起的？為什麼民進黨第一次執政的收尾、以及第二次執政的衝突都來自於其與工商界的關係？這必須要追溯民進黨從創黨前到二次執政的三、四十年間，到底民進黨的前前前世與商人們的關係是什麼？民進黨創立以後，其社會基礎是立基在什麼前提之下的？

第二節 早期民主運動的政商關係：傳統

仕紳參政 1950-1977

此一時期的黨外運動³為地方山頭各自發展，而有些政治人物本身有從商、或是與商界網絡關係密切，他們自己會有個別的政商網絡。本節首先以吳三連、郭雨新為中心，探討傳統仕紳參政的政商關係。接著再以受訪者P7於此時期的回憶為內容，預示了非傳統仕紳參政的下一階段的民主運動故事。

吳三連的回憶錄提到「那個時候的國民黨跟現在不一樣，不像現在把黨內外區分得那麼清楚。」（吳三連，1991:143）1950年吳三連選台北市長的時候，作為一個無黨籍候選人，國民黨也沒有刻意打壓。而自由中國事件以後，吳三連與台南紡織企業集團（台南幫）也是「魚幫水，水幫魚」，政府給予台

³ 在這一階段，「黨外」尚不是一個「成熟的反對勢力群體」的具體稱呼，當時普遍會稱「無黨無派」，但為了行文方便，在此仍統一使用「黨外」或「民主運動」。

南幫特許。如例如設立環球水泥特許、以及南紡的紗錠配置⁴。（謝國興，1999）剩下吳三連「溫和」的反抗：經營自立晚報。吳三連早年赴日就讀一橋商業專科學校，是板橋林家出資贊助。（吳三連，1991:31）吳在日本積極參與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時，由於當時日本經濟疲軟，板橋林家的華南銀行也面臨一些困難。因而板橋林家大掌櫃許丙曾勸吳不要太過激，然而許丙也僅只勸說而已，寬容的讓吳三連自由的表達政治意見。（吳三連，1991:55）

另一個重要黨外山頭，是省議會五龍一鳳之一的郭雨新。郭雨新 1926 年就讀宜蘭農林學校開始，就是由板橋林家五少爺林松壽出資贊助讀書⁵。郭雨新 1934 年畢業於台北帝國大學後隨即任職於板橋林家的公司。戰後，郭雨新開始青果進出口事業以及農業機具進口。1963 年，郭雨新與高雄陳家陳啟清合資創辦南山人壽，然而郭雨新只在南山待了一年，就經營權易手，離開南山。郭雨新的事業範圍非常廣，但是他的首席助理王能祥（2013:227）在訪談錄裡面提到「郭雨新長期以來一直活躍於商場之上...（中略）...但經營企業對他來說，與其說是為了營利，不如說是為了應付政治開銷。」1975 年幫忙郭雨新助選的 P6 先生就表示：

郭雨新總部都設在宜蘭市，那宜蘭市的北館市場、南館市場那裡的攤商（經濟上）都很支持...（中略）...我是有聽說那時候他有一些老同事，那時候都是台北的紳士，就是比較出名的，會私下給他（錢），我有聽說。⁶（括號內文為作者依照文脈加上）⁷

顯示當時「仕紳參政」的典型政商型態：自身人脈，加上地方名望。但是 1973 年，郭雨新參與增額監察委員間接選舉，被國民黨封殺，零票落選。再加上 1975 年他在增額立委選舉敗給大企業家林榮三，郭雨新深覺台灣已經無法發展，於 1977 年選擇出國度過餘生。郭雨新要出國時，也是靠吳三連、仰德集團創辦人許金德兩名商場好友跟國民黨疏通才得以成行。（張文隆，2013）

1969 年 11 月，台北市改制直轄市後第一次市議員選舉，同年 12 月，台灣舉行「中央公職人員增選補選」開啟了 1970 年代「黨外」初試啼聲的第一聲號角。這一年，兩位往後在黨外運動擔任要角的政治人物躍上檯面：一位是被稱為「台灣永遠的歐吉桑」的黃信介先生、另一位是本研究受訪者 P7 先生。黃信介為台北大龍峒世家，還算得上是「傳統仕紳參政」的範圍，而 P7 先生則是加油站員工出身，家世背景並不雄厚，卻擁有國立大學學歷。這也預示了接下來

⁴ 對於台南幫與吳三連的關係，說負面一點，可以說是吳三連被「招安」而棄政從商；也可以說是由於雷震案「被迫」放棄政治，從吳三連或是台南幫核心人物的自述裡面，我們無法得知吳三連對於這件事的看法。

⁵ 這是台灣傳統社會士紳階級的「為鄉舉才」的傳統。板橋林家長期被視為日本殖民政府的「御用仕紳」，相較於霧峰林家積極主導民族運動，是比較「溫順」的地方勢力。然而由此看來，板橋林家的「為鄉舉才」也意外延續了台灣本土菁英的反抗精神。（此處感謝口試委員陳翠蓮教授的指正意見。）

⁶ 作者訪談，訪談編號 P6，台北市信義區，2019 年 08 月 20 日。

⁷ 本文後續所提及的訪談內容，為求閱讀通順，括號中的文字皆為作者推測上下文所加。

黨外的政治菁英將脫離「仕紳政治」的傳統，邁向「社會向上流動」的中產階級為主體。

P7 於 1969 年參選台北市議員時，「政治氣氛很緊張，經常我前腳進到人家家裡去拜票，警察後腳就跟著去警告，左鄰右舍三天兩頭受到管區警察的騷擾，不太敢公開幫忙。」（陳政農，2013:54）雖然「政治氣壓很低」但是仍有感人的故事：

那時候在造勢，走在汀州路上就有人塞一包黑黑的給我，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回家打開一看嚇到，都是一些零錢，但是雜七雜八（li-li-khok-khok）加起來也有千。我聞上面的味道，應該就是一個賣吃的，小販，存的錢就都塞給我。⁸

最後，P7 先生順利當選台北市議員。1969 年發生在 P7 身上的感人故事，將在接下來十多年、一樣是民主運動的同志身上不斷地重演。

第三節 從中壢事件到組黨：在風聲鶴唳

下為民主投資 1977-1986

第二個時期，以黨外雜誌、選舉為中心，黨外運動開始組織化的進程——邁向沒有黨名的黨，到最終成功組成民主進步黨。在此過程中，民主運動以理念推廣為主，人脈關係為輔，開始牽動本土中小企業的支持網絡，並於 1986 年組成反對黨後，一個強大的社會聯盟躍上檯面。

此一時期政商關係的觀察面向是：1977 年到 1986 年歷次選舉⁹，社會氛圍如何？在肅殺的社會氛圍中，反對勢力的競選經費是如何得來的？本研究的結果發現，此一時期的政商關係特性為：一、完全匿名性、二、沒有持續性的政商關係網絡、三、小額捐款。

首先，許多受訪者都指出 1979 年美麗島事件以後「政治氣壓很低」，社會瀰漫著不安與肅殺之氣。這個時期的幾次選舉：1980 年 12 月第三次增額中央民代選舉、1981 年 11 月地方五項公職選舉，甚至到了 1983 年第四次增額中央民代選舉，台灣社會都還在恐怖的氣氛當中。以受訪者 P4 為例，他參與了

⁸ 作者訪談、陳翠蓮陪訪，訪談紀錄 P7，台北市中正區，2019 年 08 月 30 日。

⁹ 計有 7 次：1977 年五項地方公職：省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選舉（後稱五項公職）、1978 年增額中央民代選舉（停辦）（後稱增額民代）、1980 年增額民代、1981 年五項公職、1983 年增額民代、1985 年五項公職、1986 年增額民代。

1978 遭到停辦的增額立委選舉、以及 1980 年、1983 年兩次增額立委選舉，在受訪時，他的妻子回憶到丈夫於 1980 年參與選舉時這麼說：

當時（民國）67 年跟（民國）69 年出來的時候，尤其（民國）69 年的那次，那時候吼，沒人敢祝福啦，看衰你啦。我們又剛好美麗島事件過後，我們的服務處在台北縣，因為三個選區……基隆跟那個台北縣。基隆（的服務處在）棺材寮裡面啦，他就給我們很小的那個啦。還有台北縣的，隔壁就是棺材店啦，沒有人房子要租我們。宜蘭你等一下可以看到，是人家蓋的房子，蓋到還沒有好的，那個借他啦，就是這樣子啦。那時候氣氛是這樣子啦。¹⁰

「找不到有人願意租競選總部」似乎是那個年代黨外選舉的常態，受訪者 P8 在 1981 年的台北市議員選舉、以及 1985 年的台南縣長選舉兩次都遇到一樣的問題。¹¹下圖 2-1 為 1980 年增額立委選舉時 P4 位於宜蘭的競選總部，位在一個未完工的建築裡。



圖 2-1 1980 年 P4 競選總部

¹⁰ 作者訪談、P4 配偶陪訪，訪談紀錄 P4，台北市松山區，2019 年 08 月 08 日。

¹¹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P8，高雄市鼓山區，2019 年 08 月 31 日。



而憶起 1981 年地方五項公職選舉，另一位在也宜蘭參選省議員的受訪者 P6 是這麼說的：

1981 我選的時候... (中略) ...1979 就美麗島事件、1980 就林宅血案、1981 陳文成命案，所以我那年我要選的時候那個**政治氣壓很低**。... (中略) ...所以我要選的去年，才發生林宅血案，再前一年，才發生美麗島事件。大家會怕，會怕。這個很肅殺，那時候叫做政治氣壓很低，那時候有流行這樣一句話。¹²

政治兇案的陰影還在，這些政治菁英就堵上性命去跟獨裁者一拼。那麼在這樣的「政治低氣壓」之下，民主運動的資源動員又是怎麼進行？當年的競選經費需求雖然不多，但沒有錢還是萬萬不能。那麼，錢要從那裡來？

吳乃德 (2020) 稱 1977 年至 1987 年為台灣「最好的時刻」，這是一個人性光輝昂揚、人民在政治壓迫下仍然堅持反抗的時代。歷經了美麗島軍法審判、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江南命案，縱使統治的手法壓迫、恐怖，反對運動的政治菁英依然奮起，人民也無畏地給予支持。許多人仍然記得 1980 年與 1983 年的增額立委、國大選舉，美麗島受難者家屬周清玉、許榮淑、方素敏「代夫出征」的那幾場選戰。其中 1983 年方素敏競選立委時播放的《望你早歸》則是經典的場景，許多受訪者都對那次選舉印象深刻。當年幫方素敏助選的 P9 這樣回憶到：

方素敏，林義雄的太太，他 (1983 年) 出來選立法委員，我們最感動，我們去發傳單。他沒有什麼演講，他也不太會演講，但他在台上只要你播放那個《望你早歸》，那是個很悲情的歌曲。一播放，民眾開始流眼淚。就開始投，身上 (的錢)，很多人身上除了錢 (鈔票)，連零錢都丟了，就丟到台上。¹³

而當年在彰化經商的中小企業老闆 S1 回憶到：

方素敏出來選立委那一次，我 (從彰化) 也跟著去三重埔欸，他在造勢 (人太多) 都沒辦法進去，我出來在附近圍牆，圍牆附近也都是人欸，都要翻圍牆進去了。後來他車要出來的時候，我們要給他捐款，要怎樣 (做) 咧？那個錢給他網一網丟上去車頂，阿不是只有我一個欸，大家都這樣。¹⁴

1980 年增額立委、國代選舉時，曾幫周清玉、許榮淑助選的 P5 這樣回憶到：

(1980 年許榮淑、周清玉選舉) 那時候去演講，把大家喊來，聽完就把錢丟去車頂，大家把口袋的錢掏出來就往車上丟。然後宣傳車開回來的時候還用那個外套，因為冬天，把錢這樣包起來、扛進來。我們

¹²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P6，台北市信義區，2019 年 08 月 20 日。

¹³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P9，新北市新店區，2019 年 09 月 11 日。

¹⁴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S1，彰化縣彰化市，2019 年 08 月 16 日。

那時候都是學生，我的同伴，笑到不知道，整個晚上都算錢算不完。啊沒有人跟我們出面說「這些錢是我捐的，你要幫我留一個據、留一個名。」沒有人敢，捐了就跑。如果有人跑來事務所，錢捐了就跑。外面捐的都是小款，這些大款都是你所謂的**中小企業的贊助者**，因為他本身它就可以控制自己的財富，他有賺到錢，力有所及他就給我們捐。¹⁵

這個「丟錢到車上」的敘事，是黨外參與者、支持者的普遍記憶。大家都還記得那個不為了什麼利益算計、不為政治鬥爭的美好年代。偷偷塞錢、丟了錢就跑、募款箱到台下繞一圈就塞爆，這些的故事一直出現在口述訪談之中。這些小額、匿名捐款就是當年戒嚴時期黨外運動的柴火，小額捐款的星星之火不一定可以燎原，但是可以成為一個溫暖的希望。

除了這個典型的「丟錢到車上」的故事，另外一個觀察面向是黨外政治菁英的本身社經地位、以及他參與政治活動的地區屬於鄉村或都市。受訪者 P8 是美麗島辯護律師團成員，他於 1981 年參選台北市議員，踏入政壇的第一步。他對於當年離開穩定的律師職業生涯，踏上從政之路仍然記憶猶新，甚至連當時的競選花費都記得清楚：

（1981 年的台北市議員選舉）我們就花了 150 萬，那我自己拿出來的錢是 120 萬，等於說捐款、樂捐的只有 30 萬，非常的少，所以完全是靠自己。...（中略）...我們就沒有所謂的中小企業捐款的問題。因為當時如果有，當然一部分是中小企業，私底下塞給你，一方面就是說好比說自由業，自由業比較不怕死的。就是說律師、醫生、會計師這種。所以說自由執業的，跟中小企業的，大概主要來源是這個。當然有些就是親戚朋友啊。¹⁶

P8 的例子是黨外候選人中的一個典型：中產階級、專業者參政。政治菁英在投入政治以前已經有一份專業工作，甚至有足夠的存款來支應競選經費。而其他小額捐款則是靠著中產階級本身的社會資本、人脈，去與其他同為專業者的醫師、律師募款，最後才是單純的靠傳統關係的人脈。他所謂的「沒有中小企業捐款的問題」是相比於從 1990 年代起，中小企業開始「系統性」地、大量地捐款進來。此一時期的捐款並沒有這種現象，而是維持「完全匿名性」私底下塞給你，這些受到捐獻的候選人並不認識捐款人。中小企業的捐款可以說是完全理想性的資助，沒有對價關係。

但並不是每個黨外政治人物都在都會地區選舉，都會地區聚集了大批的中產階級、專業者群體，這些人都是 P8 選台北市議員時的支持者、資助者。也不是每個黨外候選人都是律師、都是中產階級，能夠如同 P8 一樣自己拿出 120 萬支應選務。受訪者 P6 出身宜蘭農村，1981 年初次在宜蘭正式參選省議員時，

¹⁵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P5，台北市大安區，2019 年 08 月 19 日。

¹⁶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P8，高雄市鼓山區，2019 年 08 月 31 日。

學歷只有夜校畢業，沒有亮眼學歷、沒有專業身份如律師、醫師。他對於當年在鄉村地區的宜蘭選舉募款的印象是：

那時候沒有什麼董事長支持我們的啦，你如果是這樣的中小企業...
(中略)...比如說以前，機車行啦或者是...我那個時代支持我們的，
印象最深、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市場裡面的攤商**。那攤商，譬如說屠宰
公會，屠宰公會是支持黨外的。...(中略)...有時候他們講一講就半
條豬帶過來。¹⁷

而 P6 也對於 1981 年小額募款的情況記憶猶新，他總共募得 95 萬元，其中最大一筆是 10 萬元，其他都是非常小額的款項。選舉結束後總共花費 85 萬元，結餘款剩下 10 萬、以及一些剩餘物資拿去成立服務處。而這筆最大的 10 萬元捐款，竟然來自一位素未謀面的人，而且後續也都沒有繼續聯絡。¹⁸P6 的例子呈現了一些重要的觀察：如果本身不是中產階級、或是選區位於鄉村地區，小額捐款將佔大部分的競選經費，而這些小額捐款通常都是完全匿名的、不認識的人捐的。同樣的觀察也出現在同為宜蘭地區選舉的 P4 上。P4 於 1980 年增額立委選舉在宜蘭參選並且當選，他的花費為 100 多萬，其中除了賣「選舉書」外，大部分都是匿名的小額捐款。¹⁹

以上幾個案例顯示，當時的政治氛圍之下，政治捐獻的情況是「完全匿名性」、以及「小額」。完全匿名意即受捐助者與捐助者並不認識，也不會有持續性的社會關係，只會留下「好像都是什麼人捐給我」的印象，例如 P6 所說的攤商公會、或是 P4 說的中產階級、中小企業。大部分靠的就是「沒有面孔」的大眾一筆一筆慢慢累積而來的。

在此一時期，中小企業與民主運動的結合是「沒有面孔的」、是「檯面下」的，就連被資助的政治人物都不知道「那個塞給我一大包紅包的老闆」是誰？本研究由於樣本數不足，無法進一步肯定這些「沒有面孔的人」是不是真的都是中小企業老闆。但是普遍來說，「中小企業老闆的資助」仍存在於本研究多數受訪者的回憶裡，在後續章節仍會持續提到。

¹⁷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P6，台北市信義區，2019 年 08 月 20 日。

¹⁸ *Ibid.*

¹⁹ 作者訪談、P4 配偶陪訪，訪談紀錄 P4，台北市松山區，2019 年 08 月 08 日。

第四節 民主轉型期民進黨的政商關係：

走上檯面的社會結盟 1986-2000



1986年9月25日，民主進步黨於台北圓山飯店宣布成立。從歷史的意義來看，這是繼1927年蔣渭水成立台灣第一個現代政黨「台灣民眾黨」以來，再次有台灣本土勢力成功組黨。從民主化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重大里程碑，反抗威權的政治勢力走上檯面。對內，反對勢力克服了山頭林立、各自為政的派系政治，對外，反對黨沒有面臨威權政府的流血鎮壓。組黨迫使政府於1987年宣布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讓民主化的進程向前邁出一大步。

本研究發現，1986年的組黨，標誌著黨外勢力——民進黨的政商關係開始發生本質上的變化，而中小企業與民進黨的結盟也在此時期走上檯面。為何組黨是改變政商關係的關鍵事件？探究原因，民進黨的組黨對於支持者有兩層意義：一、反對運動的政治菁英將運動強度「升級」了，成立政黨直接挑戰威權。二、這個升級沒有被威權當局取締，雖然「不被承認」，但民進黨的存在已經漸漸安定。在這兩層意義之下，支持者們一來可以跟著政治菁英的「行動升級」，將支持行動跟著「升級」。二來威權當局沒有取締民進黨，像是默許了反對黨的「牌照」。所以支持者們就比較敢放膽支持，進而連帶著使得中小企業與民進黨的結盟浮上檯面。

而這個政商關係的大轉變有三個面相。第一，特別值得關注的變化是：透過募款餐會、成立服務處，持續性的政商關係開始出現，捐款常態化。第二，民進黨政治人物透過自身參與的「中產階級結社」例如青商會、扶輪社結成一個強大的「後援會」系統，其中佔多數的也就是中小企業主。第三，大型企業也開始「押寶」民進黨，形成「多邊通押」的政商關係形勢。

首先，募款餐會作為現代台灣政治常見的造勢、募款方法，於1986年前後開始為黨外／民進黨候選人大量使用。雖然曾經為多位黨外政治人物助選的P9早在1981年於屏東幫蘇貞昌選省議員時、以及1983年在桃園幫張德銘選立法委員時，就舉辦過募款餐會。然而依據P4回憶，他直到1986年在北基宜選區選舉立法委員時才有募款餐會；而P6與P8則回憶到戒嚴時期很少有募款餐會這一套作法，多數受訪者印象中要到組黨、解嚴前後才有募款餐會。而直到1990年代，募款餐會「爆桌」的回憶開始烙印在這些民進黨人士腦海裡。例如P4回憶到1995年參選立委的時候，在板橋體育館前辦桌席開1000桌，參與人數超過10000人以上，募款熱烈。

黨外／民進黨募款餐會有許多功能，除了募款，還包括政見發表、動員的功用。P9 就說明到：

募款餐會對他們（候選人）來說很好，第一個，會帶人氣，會帶人氣。那你募款餐會，就不用登記啊，那個時候我們又不用去借場地演講，我是餐會啊，啊募款餐會合法不合法，以前就是沒有嚴格規定，所以你就可以這樣想，其實呢，等於是演講會了，那是競選演講，又是政見發表、又有錢可以拿，還可以募款，可見那是一箭雙鵰嘛，非常好的活動方式。²⁰

募款餐會同時又有動員的效果，P9 說道當年幾乎不需要去費力賣餐券，因為很多企業主都一次幾本餐券買下來，發下去給員工吃。或者是例如多少人集資合買一張餐券，派代表一個人去吃等等，買氣很旺。

而在此時期，由於選民服務的需求大增，黨外／民進黨候選人當選以後開始成立規模比較大的服務處。P6 就說明，1981 年他在宜蘭剛選上省議員時，受到民主前輩郭雨新的影響成立服務處，並且嚴格規定自己每週固定時間必須在服務處處理民眾問題。當時的服務處只有羅東鎮一處，聘請一位員工接電話，P6 說他省議員的薪水就可以處理這個開銷了，畢竟他在霧峰省議會也沒有額外的議會助理，只有開設這一個地方上的服務處。然而，時間到了 1987 年，選區橫跨北台灣三縣市的 P4 就表示：

我（1987 年 2 月當選立委）在各地成立服務處，因為服務處你要有支持力量，譬如說台北縣有三個，後援會有三個捏，那一個服務處都要十萬以上捏，三個服務處就三十萬以上欸，三個服務處加起來一年就要三四百萬，那錢從哪裡來？我薪水不夠啊。我的服務從來不跟人家收費的，我們又是不貪污的，又不跟人家收費，那錢從哪裡來？就是從那個義工裡面來，還有有些就是你所提的中小企業經營者他們就支持你來。²¹

雖然 P4 的案例可能因為立委選區比較大，開設服務處的資金壓力自然比較大。但同樣的問題，P11、P8 也認為解嚴後開設服務處的比較多。而具體的案例是中小企業老闆 S1 從 1993 年開始，支持擔任立委的謝聰敏在彰化縣開設服務處，他清楚地回憶到：

服務處光租金、電話、還請人，請兩個人，一年要 300 萬。阿如果這 300 萬讓他（謝聰敏）付的話他拿什麼來付啦？對不對？最省的喔。...（中略）...那第一年是有募款，差不多募了接近 300 萬。第二年我就找個朋友說你有錢了嘛！他再找兩個朋友進來，三個人來接手

²⁰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P9，新北市新店區，2019 年 09 月 11 日。

²¹ 作者訪談、P4 配偶陪訪，訪談紀錄 P4，台北市松山區，2019 年 08 月 08 日。

(服務處的資金)。結果那第二年、第三年，他連續當兩屆立委²²嘛，六年。我當一年(財務負責人)，剩下五年嘛，他們三個人撐五年!(五年下來每)一個人共花了500萬。...(中略)...(服務處營運)五年總共1500萬。²³

不同於競選經費是「一次性」的花費，僅用於選舉時期，服務處的經營就必須要有一個穩定的資金來源。候選人在選上之後，因應日趨龐大的選民服務需求，必須成立服務處，因此，找到長期支持的資金來源就成為了當務之急。

那麼要到哪裡去找金主？候選人本身的社會資本、人脈就派上用場。長期捐獻的金援支持，不能夠再只靠熱血的街頭演講、或是悲情的選舉造勢，而是要靠面對面、長期的交往、信任關係。而且面對日益膨脹的選舉花費、選區經營費用，民進黨政治人物不能夠再只靠短期的激情進行資源動員。政治人物本身的社會資本、人脈在此時就派上用處。

而民進黨政治人物當年最穩固的人脈資源來自「中產階級社團」，例如青商會、扶輪社。這些社團在戒嚴時期由於是國際性、非政治組織，所以威權體制容許他們存在，而到了解嚴前後，這些組織裡的黨外、民進黨政治人物則開始利用這些當局較無法控制的民間組織進行資源動員。例如長期在台北市耕耘的P8就說明到，當年支持者藉由「扶輪社」這個「殼」，以「支持社友選舉」來包裝「支持民進黨」，比較不會麻煩；同時也以扶輪社為主幹成立「中小企業後援會」：

我(1989年)當選立委後參加台北北門扶輪社，北門扶輪社裡面，就有醫生、有律師、最主要的，還是中小企業。啊所以為什麼會有中小企業(後援會)，事實上就是要做一個骨幹，我所參加的北門扶輪社這一些中小企業，包括我們的母社，包括我們社友的社友啦，就是你們有共同朋友，那社友跟社友之前可能又有很多的朋友，那就一直搭、一直搭就這樣一直擴大、一直擴大。所以中小企業是以扶輪社為主，扶輪社的社友為主所延伸出來的中小企業的后援會，啊也是靠這些人在出錢。²⁴

而在彰化參選，本身也有參與中產階級社團「青商會」的P11也這麼回憶：

(支持民主運動的)第二個力量就是你這裡講的企業界人士，我(1992年)在彰化選舉那時候，鹿港最明顯，鹿港有一些也是我青商會的朋友，也都是貿易商，工廠就跟貿易有關係，工廠就是出口。所

²² 實際上謝聰敏1993-1995第二屆立委時是全國不分區席次，1996-1999第三屆立委才是彰化縣選區的席次。

²³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S1，彰化縣彰化市，2019年08月16日。

²⁴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P8，高雄市鼓山區，2019年08月31日。

以他們一方面在工廠管理，一方面他們要出國去賣東西嘛，就消息比較靈通，而且他也知道國際情勢的變化。²⁵

選舉激情的捐獻當然重要，但是這些長期經營的人脈關係，才是維持政治人物日常開銷的重要來源。這也呼應了家博 (Jacobs,2008)對於台灣鄉村政治研究所關注的「關係政治」，顯示出「關係」不只是維繫威權侍從主義下地方派系的重要元素，甚至也是民主運動的重要元素。

最後，是此一時期的大企業對民進黨的支援也漸漸浮上檯面。雖然威權時期也不乏一些看似靠近黨國、或是中立的大企業實際上默默支持黨外的案例。例如 P5 就說過國泰集團蔡家當年對於政治犯的保護：

我們小時候覺得說蔡家為富不仁整天搞保險，保險就是坑人的啊。
(但是)他也有一些很奇怪的地方，他的企業裡面大家都要說台語，還有其實他們對政治犯同志很好，對政治犯的那些朋友，在那個世代。像是我研究過的，很多人在蔡家的企業裡面工作，不是主要的，可能是蔡家的廣告公司、或是蔡家的什麼。他們對那些政治犯其實很優遇、很優待。而且他們替這些人擋住調查單位跟國安單位的繼續迫害，他們夠大，可以擋得住。²⁶

另外 P5 在 P7 底下的黨外雜誌工作時，也聽過美商花旗銀行的台灣分行高階經理人（本省人）曾給 P7 很大幫助等等。而 P10 也透露他 1999 年在台北市選立委時，因為地緣關係也受到義美公司很大幫助等等。

透過本節的討論，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在 1986 年組黨以後，中小企業與民進黨的關係愈發緊密，有企業主長期支持某位政治人物的服務處的案例、也有透過「中產階級社團」動員中小企業老闆的案例。這已經是走向「結盟」的狀態。同時回答了本研究的第一個研究問題：中小企業有沒有和民主運動形成「社會聯盟」？答案是清楚的：中小企業的確在這 15 年間（1986 年至 2000 年）與民進黨形成了一個（浮上檯面的）社會聯盟。

第五節 小結：中小企業社會聯盟的歷史

脈絡

本章回答了本研究的第一個研究問題：中小企業與民主運動／民進黨形成了社會聯盟。但本研究並沒有宣稱所有的中小企業作為一個階級或群體，有意

²⁵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P11，台北市中正區，2019 年 09 月 18 日。

²⁶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P5，台北市大安區，2019 年 08 月 19 日。

識的、集體性的為了理念、甚至集體利益而支持民進黨。中小企業當然有藍有綠，本研究指出的是：在民主運動、民進黨的資源動員方面，許許多多的中小企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些中小企業與民進黨結成了社會聯盟。1986年到2000年這15組間是台灣民主政治劇變的年代，對於解嚴前後的政商關係轉型，先行研究例如王振寰（1996）、陳東升（1995）等人的研究幾乎都集中注意力在執政的國民黨的政商關係轉型，較少聚焦當年仍在野的民進黨。而邁入2000年代的民進黨政商關係研究，例如黃宗昊（2013）、陶儀芬（2008）又粗略帶過這15年，忽略了民進黨／民主運動／黨外的傳承關係。中小企業有沒有「作為一個群體」集體性的與民進黨結盟？本研究僅能粗略的歸納出一些線索，尚無法深入以嚴謹的方法探究這15年關鍵年代的政商關係轉型，有待後續更全面、細緻的研究與探討。

整理中小企業與民主運動／民進黨的關係，在本章的討論之後我們可以有這樣的歷史認識：1950年到1977年中小企業對於民主運動的支持幾乎看不到，一來「民主運動」本身還不是一個固定的群體、不是一個固定的概念（如往後的「黨外」概念，二來當時政治氣氛肅殺，社會對於民主運動的支持還未成形。1977年到1986年，這時候的中小企業支持者形象已經浮現，他們可能隱身人群之中，有些可能丟了錢就跑，零散地給予支持。唯有當政治人物當選之後，這些「沒有面孔」的中小企業主才會默默浮現。到了1986年以後2000年以前，組黨以後，中小企業開始能夠放膽支持民進黨，特別是中產階級社團為主體的人脈網絡塑造了民進黨與中小企業的「社會聯盟」。

本章透過長時期歷史的梳理，將本研究的焦點「中小企業社會聯盟」放入歷史之中，同時也「提取至當代」。首先，「放入歷史」，本研究的焦點放在中壢事件後1977年至政黨輪替2000年，而本章梳理了1950年至2020年民主運動／民進黨政商關係的大致歷史。1977年到2000年中小企業與民主運動的關係是個歷史問題，在歷史脈絡上與前後時期有其連續與斷裂。第二，「提取至當代」，到了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民進黨的政商關係是更複雜的情況，本研究無法處理。但本研究至少能夠闡明中小企業與民進黨政商關係的「起源」也就是1979年至2000年的時間斷代。我們若不知道起源，何知道路徑？政商關係延續到了2000年代以後的當代，參入了更多因素：例如1990年代開始，中小企業開始出走西進、大型化；2000年以後總統的個人政商網絡等等，路徑撲朔迷離。本研究要將故事從頭說起，我們才能知道結局是什麼，這就是「提取至當代」。

第三章 翻開民主運動的帳本



講完民主運動的縱深與政商關係，讓我們翻開民主運動的帳本，一筆一筆核對當年黨外政治人物手上的帳目。本章的目的是透過政治菁英的訪談，了解當年民主運動的收支概況。首先，我們要了解黨外的選舉收支、日常的收支、以及黨外邁向組織化的開銷。接著，我們再從政治菁英的訪談中，理解民主運動的資源動員框架 (framing)。最後，我們要回應一個最基本的問題：民主運動缺錢嗎？

第一節 民主運動的支出與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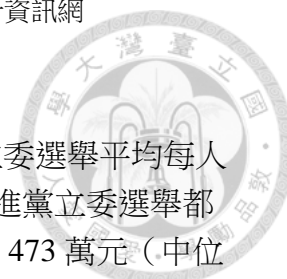
所謂的民主運動，包括了許多種戰略位置。包括選舉、街頭運動、辦黨外雜誌、黨外菁英橫向串連等等。黨外政治菁英的各種運動策略都需要不同程度的經濟資源，本節將以選舉收支、日常收支、組織化開銷三個項目分別說明。

壹、選舉收支

選舉是黨外運動／民主運動最花錢的事。相比與其他抗爭手段，選舉最需要資源挹注，卻也是對抗威權最有效的手段。根據受訪者透露、自我揭露的選舉支出如下表 3-1。

表 3-1 黨外／民進黨候選人選舉支出

候選人	時間	選舉類別、選區	支出(萬)	2016 物價(萬)*	當選	來源
P7	1972	台北市增額立委	45	233.4	○	P7
黃天福	1972	台北市增額國代	45	233.4	○	P7
P3	1973	彰化縣員林鎮鎮長	5	24.0	×	P3
P4	1978	北基宜增額立委	80	213.0	停辦	P4
P4	1980	北基宜增額立委	100	203.9	○	P4
P6	1981	宜蘭縣省議員	85	148.9	○	P6
P8	1981	台北市市議員	150	262.8	○	P8
P6	1985	宜蘭縣省議員	195	328.1	○	P6
P8	1985	台南縣縣長	200	336.5	×	P8
周清玉	1986	台北市增額國代	200	334.2	○	M2
蘇煥智	1992	台南縣第二屆立委	800	1115.4	○	P9
P4	1995	台北縣第三屆立委	1000	1255.2	×	P4



參照表 3-1，相比於近年選舉的支出，例如 2016 年區域立委選舉平均每人支出 1041 萬元（中位數 758 萬）²⁷，而 1995 以前的黨外／民進黨立委選舉都不超過 1000 萬元。或是 2018 年台北市議員選舉平均每人支出 473 萬元（中位數 410 萬）²⁸，而 1981 年黨外台北市議員卻只支出 150 萬元。隨著時代越晚進，由於競選的激烈程度漸增、選舉活動的多樣化，競選花費逐年增加。但是相比於執政黨／國民黨的競選經費，黨外／民進黨的選舉支出仍然算是少的。雖然本研究沒有問到當時執政黨（國民黨）候選人的競選支出，但根據受訪者們的回憶，當年競選對手的花費是自己的數倍，而且也會傾向提名比較有財力的候選人（訪談編號 P3、P4、P8、P11）。

而有關於黨外候選人的支出細目，曾經幫助多位黨外／民進黨候選人製作競選文宣的 M2 以 1986 年周清玉競選連任國代的選舉為例，當年競選傳單總共印發三波、加上其他宣傳費，共花了 80 萬，而全部競選支出不超過 200 萬，亦即宣傳費接近一半，剩下的是人事、競選總部租金、交通、其他雜支等等。當時由於媒體還受到控制，也沒有向電視、電台、報紙、雜誌買廣告的可能。

（訪談編號 M2）而解嚴前嚴格規定競選期間限制，這個競選期間是很明顯的「民主假期」。同時，短期的競選期間也能節省競選支出，不會像現在從黨內初選開始算，競選期間約一年，就有一年的競選開銷要支應，當年可能集中在一兩個月就會分出勝負，資源的投入會比較集中、也比較容易動員。（訪談編號 P8）

收入方面，除了上一章提到的小額捐款、募款餐會以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來源：賣書。例如 P7 回憶到在 1975 年競選台北市增額立委時賣書，一本賣 150 元，總共銷售了 1 萬本，光賣這一本書的利潤，該次選舉的經費就足夠了。P4 則回憶到他每次選舉都會出一本書，有時候一個晚上的演講，賣書最多可以賣到 10 萬以上。而 P11 則解釋了「選舉書」為什麼好賣：

那時候書很好賣，台灣的資訊開始在爆炸，警總一直在禁嘛，啊我們這種書又提供很多以前看不到的資訊，所以進這個黨外書很好賣。像這個《XXXX》一本賣 100 塊，成本差不多 10 幾塊錢而已。...（中略）...我那時候大概《YYYY》、還有一個《ZZZZ》、還有一本是這

²⁷ 原始資料來源：鏡傳媒、g0v 合作網站「數讀政治獻金 3.0」<https://github.com/mirror-media/politicalcontribution> 查詢於 2020/12/16。

²⁸ 原始資料來源：監察院政治獻金公開查閱平台 <https://ardata.cy.gov.tw/data/search/election> 「107 年直轄市議員選舉」臺北市首次申報資料。查詢於 2020/10/27。

個《WWW》，《WWW》就很好賣，一本印刷也是 10 幾塊錢，可以賣到 100 塊。²⁹

賣選舉書不只能夠詳細闡述候選人的政見、心路歷程、對政治的洞見等等，更可以賺到選舉所需的花費。下圖 3-1 即呈現出 1992 年 P4 競選立委時晚上演講賣書的盛況。



圖 3-1 1992 年立委選舉 P4 賣書募款

資料來源：P4 提供翻攝。

至於黨外／民進黨候選人的競選收支差異，例如城鄉差異、派系差異、候選人本身社會地位、社會資本差異等等，由於樣本數不足，本研究尚無法深入探討。但可以想見黨外政治菁英在「開疆拓土」時必然會遇到許多地域性的差異，以及因為候選人個人氣質的差異也會影響。

貳、日常收支

黨外／民進黨政治菁英的日常收支非常複雜，有當選、落選之別，新生代、非新生代之分，有本身有事業的、也有家無恆產的。在這裡討論的是「民主運動」的日常收支，亦即屬於「運動」一部分的才算入「日常收支」一部分。那麼，什麼是民主運動的「日常」呢？如果是有當選公職的政治人物，問政、質詢、選民服務、甚至施政就是日常了。而如果是無公職的政治菁英，有可能是不願意投入選舉、或是落選、或是尚未準備好選舉等等因素，這些政治菁英的「日常」重心就會放在街頭抗爭、黨外雜誌。前者的問政、選民服務的

²⁹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P11，台北市中正區，2019 年 09 月 18 日。

部分已於上一章解釋「服務處」日常開銷時討論過，以下將著重在黨外雜誌、以及街頭抗爭的收支部分。

包澹寧（1995）的研究指出台灣民主運動中「黨外雜誌」的重要地位。因為政論雜誌可以在日常創造持續的影響力，持續為民主發聲，不必受限於選舉期間才有的「民主假期」。同時，黨外雜誌也是許多黨外新生代棲身工作的地方，維持了日常組織的功能。例如長年做黨外雜誌經銷商的 M1 就說明，黨外雜誌通常有一個政治人物當「頭」，平常就是一個團隊，到了老闆要選舉就直接轉換「戰鬥編組」，文宣團隊直接到位。例如許榮淑的《深耕》系列團隊、康寧祥的《八十年代》團隊等等。（訪談編號 M1）

黨外雜誌怎麼賺錢？真的可以賺錢嗎？ M1 就說明到，假如一本雜誌賣到讀者手中售價 100 元，其中有 20 元是書店（攤）的利潤、15 到 20 元是經銷商的利潤、20 到 35 元是雜誌社的利潤，剩下的是雜誌社的成本，包括印刷、紙、裝訂、製版、美編、稿費、人事等。亦即在沒有被查禁、且雜誌完售的情況下，雜誌社可以收到銷售總額的 20 到 35% 利潤。但是通常事情不會這麼簡單，黨外雜誌除了常常被查禁，也有銷售不佳的時候。例如 P9、P10 就表示《新潮流》常常被查禁，而且又因為內容很多「左派理論」，非常艱澀，銷售不怎麼好，常常賠錢。這時候就要仰賴主辦雜誌的政治菁英的募款能力，或甚至仰賴友好的印刷廠、配送廠商幫忙吸收，這些印刷、配送廠商是黨外民主運動的堅實盟友。

長年經銷黨外雜誌的 M1 認為當年比較穩定的雜誌系列，例如康寧祥的《八十年代》、鄭南榕的《自由時代》系列；還可以的例如許榮淑的《深耕》系列、林正杰的《前進》等等。而至於辦雜誌到底有沒有賺到錢？如果賺到錢之後，會不會對民主運動有所助益？長年擔任黨外雜誌編輯的 P5 說到：

雜誌賺錢撐（民主）運動我只知道一個人做到，就是鄭南榕。他去借錢來辦雜誌，然後在編雜誌的時候因為有生意頭腦，就知道能夠賣。他賺到錢。那個時代只有一兩家雜誌存活下來，其他都一下就倒了，只有他能夠撐很久，然後也做得比較認真。所以他是賺到錢的，他賺的那些錢通通拿去搞政治活動，支撐那個「新國家運動」、二二八平反運動。賺了錢就拿去做運動。³⁰

而 M1 則說，像《八十年代》雜誌社後來在台北市買了一棟五樓的總部，顯示獲利還算穩定。但具體來說是哪位政治人物、辦了什麼雜誌、賺了多少錢，本研究仍無法查明，有待後續研究。

³⁰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P5，台北市大安區，2019 年 08 月 19 日。

從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開始，街頭抗爭都是黨外民主運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開始以「街頭抗爭」作為一個「路線」則是 1983 年「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編聯會）結成之後，一群「黨外新生代」開始的。街頭運動要不要花錢？長年投入勞工運動的 P9 說

其實街頭運動通常就拿布條嘛，還有標語，大概這樣，沒有什麼特別。就是什麼訴求就找人來寫，都很少成本啊，幾百塊就夠啦。早期就是買紙板嘛，然後貼上海報紙，上面寫字，就這樣，沒有什麼成本。³¹

M2 長期以美工專長投入民主運動，民進黨成立以後發起的歷次大遊行，包括 1987 年要求國會全面改選，包圍中華路中山堂等等街頭運動，都是由 M2 負責美宣，他印象中街頭運動的花費其實也不多：

其實很省啦，以前的街頭運動其實很省，以前我們所有抗爭都會印傳單，大概也印不多，可能印個幾萬份，就是遊行的時候現場發，所以很省。...（中略）...譬如說我們要推動國會全面改選，我們就全島辦演講會，大概以這個理念來做宣傳。你要靠媒體很難，可能就了不起登個報紙稿，小小一塊說我要做（運動），不是登大塊的，沒有那個錢啦。可能我在這邊演講我就印個一萬張就去發、宣傳車去跑。很省，其實很省。在宣傳媒體上，一場運動大概花十來萬這樣。³²

社會運動的研究者有一個典範是「資源動員」的概念，亦即一場運動的發生必需要有組織者投入資源，動員人力、動員物質資源。從台灣黨外運動，尤其是街頭的 political 運動來看，其實投入的物質資源是少的，大部分都是勞力的動員、時間成本、人力成本的動員。

參、黨外組織化與資源動員

反對運動政治菁英之間的橫向連結，亦即組織化的工作，對於「山頭林立」的「烏合之眾」成為一個有共同理念、共同價值、共同目標的「黨外」政治勢力十分關鍵。早在 1977 年中壢事件過後，黃信介等黨外元老創辦美麗島雜誌，走向「沒有黨名的黨」成為「美麗島政團」開始，反對勢力就不斷的進行組織化的努力。但是在民主運動中，不止這種菁英間橫向組織重要，政治菁英與社會大眾之間的縱向組織也同樣重要。民主運動與中小企業的結盟就算是這樣的縱向組織。

本研究發現，政治菁英之間的橫向連結組織本身並不花費太多資源，但是「能夠進行橫向連結的政治菁英本身」的組織動員能力就變得很重要。明言

³¹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P9，新北市新店區，2019 年 09 月 11 日。

³²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M2，台北市大安區，2019 年 09 月 22 日。

之，黨外公政會或是編聯會等組織本身不花什麼錢，但是出手組織公政會、編聯會的政治人物本身的財力、或是資源動員能力就十分關鍵。

1983 年增額立委選舉，黨外人士成立「黨外選舉後援會」，立委費希平擔任召集人，而 P6 擔任秘書長，回憶到當年從黨外聯誼會到黨外後援會的財務，他這麼說：

黨外後援會吼，因為我的募款能力有問題（笑），因為我也很不敢開口去跟人家募款，所以後援會都是公職分攤的。這個公職分攤的傳統那時候就是這樣。最開始黨外聯誼會、黨外公職聯誼會，就是大家輪流請客這樣子。啊後來大家有組織的時候，就是每一個公職人員有領會議費、薪水，就是大家出，差不多就是這樣。³³

公職分攤金制度，演變到現在是民進黨的中常委募款責任額。當時的黨外公職人員一個人所支領的薪水尚可以支撐服務處的營運，開銷並不大，理應可以分攤一些組織費用。例如 P6 自己在宜蘭擔任省議員時，他的服務處只有請一位助理，霧峰省議會沒有請法案助理，而服務處也幾乎都是自己包辦所有服務項目。他表示自己受到宜蘭黨外前輩郭雨新的啟發，郭雨新在宜蘭的服務有口皆碑，使 P6 認為黨外比執政黨好的地方就是苦民所苦、服務做得好。民主化之後，P6 在中央執政擔任高位，他直言省議會時期一步一腳印、事必躬親的經驗，為日後行政能力打下重要的基礎。當年的黨外公職，大部分都給予民眾「服務很認真」的印象，推測原因不一定是他真的能做出什麼成果，有可能只是因為黨外公職的預算不足，很多事都要親自下馬處理，才會讓民眾覺得黨外政治人物很親民、很認真。總之，透過克勤克儉，公職的支薪足以支應日常政務，應當有一些些餘裕支撐「分攤金」。

那麼黨外橫向組織的實際開銷到底多大？所謂「分攤金」的要求到底多不多？事實上黨外時期的政治菁英聯合依然是鬆散的結合。橫向連結的組織所需要的金錢成本、時間成本、以及人事成本不用太多。以「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為例，P9 回憶到：

其實編聯會不需要什麼錢，只有有養一個專職。當時編聯會一開始也根本沒有養專職啊，大家都是志工投入。所以一開始編聯會本身沒有什麼經費的需求，而且他不是選舉（組織），也不用造勢，也不用其他的花費。所以編聯會就是個理念的結合，這種團體戰鬥力很強，也不需要社會很強的資源（資助）。而且出來（加入團體）的都是雜誌社編輯作家嘛，所以編輯作家聯誼會就是一個理想結盟的社團。³⁴

P9 認為編聯會、以及後來新潮流的組織活動是靠理念結合的，所辦的一些活動像是各地「民主聯誼會」舉辦講座等等，人力都是靠義工、而場地都是靠當地黨外公職。1986 年擔任編聯會會長的 P10 詳述當年編聯會的支出情形：

³³ 作者訪談，訪談編號 P6，台北市信義區，2019 年 08 月 20 日。

³⁴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P9，新北市新店區，2019 年 09 月 11 日。

(編聯會就只有)租一個辦公廳，大概就是我現在這個辦公廳的三分之二吧(約二十坪)。就是租一個地方、做一個辦公廳、有一個聚會的地方、有一個聯絡的地點、有一個協調動員的地方，就是這樣子。所以沒有什麼太多需要錢。(問：那有雇人嗎?)當然需要有，有總幹事、副總幹事，他們支薪。因為那是全職的，所以薪水的支出也不多，事實上那個時候的一個黨外編聯會的辦公室的人力規模，大概比現在的一個立法委員的辦公室還小。³⁵

P9 與 P10 回憶到編聯會時期的財務資源，都異口同聲的說「不花什麼錢」，事實上 P9 當年是一家中小企業的主管、而 P10 則是醫師，本身的財務都不是問題。甚至 P9 表示當年編聯會(以及新潮流雜誌)的錢是 P10 做醫生的薪水每個月固定捐 8 到 10 萬養一個專職人員，到了 P10 選上國大代表還會捐一半薪水出來。

而同樣是黨外政治組織「黨外公職人員公共政策研究會」(公政會)，財務延續「黨外後援會」，主要由公職人員分攤。那麼公政會會因為財務比較穩定，因此發展得比較好嗎？屬於編聯會的 P10 精闢分析：

沒有說公政會他們有公職的分擔金，所以公政會就發展得比較順利、比較好，那我們(編聯會)就沒有錢。我覺得在那個年代、80 年代，那個時候的反對運動，財務對反對運動來講好像不是一個需要去煩惱、或是要優先去思考的問題。³⁶

P10 認為「人才」或說人力資源才是當年民主運動最迫切的問題。而「培育人材」正好是一個現代政黨最主要的功能之一，這也是為什麼運動發展到 1986 年必須邁向組黨的重要因素之一。

以上的討論都顯示了黨外時期的組織化其實並不花錢，因為無論是公職人員為主的公政會還是主打街頭運動的編聯會，都不是完整的「政黨」。相比於現代政黨的功能，黨外組織只有提名、提出共同政綱的功能，並不能直接輔選、扶植政治新手、也無法進行組織動員。但是當 1986 年民主進步黨成立以後，這個新的政治組織就開始需要大量的資源動員。從迫切的黨部空間、黨工人員薪水，到各式黨組織成立所需的資金、宣傳等等，創黨初期的財務狀況如何呢？1986 年擔任「十人秘密組黨小組」及「十八人建黨工作小組」的重要成員 P6 這麼說：

(圓山組黨以後)對外要有說明，所以就去(全台各地)辦組黨說明會。那個時候動員都是只要你公布，就很多人來。組黨前後，募款就到群眾裡面去，錢就這樣進來，(群眾)就拿錢出來。所以那個時候初期的時候...(中略)...民進黨組成大家都很高興，認為可以出頭

³⁵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P10，台北市中正區，2019 年 09 月 16 日。

³⁶ Ibid.

天，那群眾募款就會很多人丟（錢）。所以初期可以說是捐款很多，但是大部分都是小額捐款。³⁷

同樣是組黨初期，於 1987 年擔任民進黨主席的 P11 回憶到：

（民進黨）那時候財務很好，很多募款，（財務）沒有問題。（黨部需要的）費用很少，辦活動也不需要錢。我們辦活動，像是一個群眾大會，五千塊麥克風裝了就好了。捐錢很多，我當黨主席的時候有人聽到說我們欠錢，馬上就來捐。³⁸

至於為什麼會黨部需要的花費很少呢？從 1986 年創黨就擔任民進黨專職員工的 M2 經驗或許能看出端倪：

我們到黨部上班其實那時候薪水很低啦，我們就領 2 萬塊，所有黨工都一樣，都領 2 萬塊。創黨黨工就是我，做了 3 年都沒有調薪。你知道創黨（的時候）黨部都是靠募款，所以當時的黨主席也說沒有年終獎金，也沒有什麼三節獎金，從來沒有啊，也沒有加班費啦。³⁹

P10 分析，他認為組黨當時的社會氛圍是新的政黨會帶給台灣一個新的希望，這個新的希望自動轉化為對於新政黨的物質支持。同樣的，M2 也認為當年在黨部工作就是為了一個理想，沒有人在談錢的問題。1989 年，《選罷法》修正通過政黨、個人選舉補助款，P1 認為這是民進黨日後穩定財務、取得政權的重要關鍵。

小結本節內容，選舉收支、以及黨外組織化的資源動員其實很節省，而日常收支裡面的街頭運動也不花錢。黨外雜誌可能有盈有虧，但黨外雜誌本來的目的就不是賺錢，而是宣傳理念、或是組建團隊。總的來說，民主運動的帳本赤字應該很少，大部分都收入都是靠無私的支持者捐獻。那麼，這些「無私的捐獻者」又是從哪裡出現的？與上一章討論的「中小企業社會聯盟」有什麼關係？

第二節 民主運動的資源動員框架

要找到這些「無私的捐獻者」就要先說服「潛在捐獻者」成為捐獻者。民主運動／民進黨是靠什麼「論述框架」讓捐獻者掏出口袋裡的鈔票？或許如同許多受訪者所說：「民主運動的財務不是優先考量的事情。」但是對於支持者來說，政治菁英的表現、論述框架有沒有打動他？都是他捐錢與否、或更進一步參加與否的依據。本節借用社會運動研究裡面的「框架理論」(frame theory)，討論民主運動中政治菁英的論述框架是怎麼打動支持者的？哪個論述

³⁷ 作者訪談，訪談編號 P6，台北市信義區，2019 年 08 月 20 日。

³⁸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P11，台北市中正區，2019 年 09 月 18 日。

³⁹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M2，台北市大安區，2019 年 09 月 22 日。

框架更「有用」？藉此來回答本研究的第二個研究問題：民主運動與中小企業的結合是「利益聯盟」還是「理念聯盟」？



壹、利益動員框架

政治菁英在論述民主運動的「動員框架」時，不只直接訴諸廣泛的民主理念，同時也會以「為弱勢代言」的正義形象來打動支持者。其中省籍、農工、城鄉等等對比都有「弱勢」的一方，因此都可以有「弱勢代言人」的論述框架。在此，「中小企業」則成為「國營企業」或「市場限制」的弱勢群體，民主運動在此也有著墨。首先，我們從黨外共同政見、以及黨外雜誌裡面對於中小企業的分析，可以知道當年黨外運動是怎麼思考「經濟制度」或「中小企業」。

1978年增額立委、國大選舉，黨外政治人物組成「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台灣戰後史上首次出現非執政黨人士的共同政見「十二大政治建設」。其中有關經濟建設的有兩項：

五、廢除保護資本家的假保護企業政策。

八、制定勞動基準法，勵行勞工法，承認勞工對資方的集體談判權。

（周琇環、陳世宏，2000:151）

第五項可以解釋為：「假保護企業，真圖利黨國」或是要求「自由貿易」，而第八項則是很明顯的為勞動階級代言。到了1983年增額立委、國大選舉「黨外後援會」二度提出了共同政見，其中關於經濟體制有一項：

七、嚴格限制農畜產品進口，保護漁民海上作業，保障勞動者之權益。消滅貪污特權及官商勾結，整頓國營事業，促進私人企業之健全發展。（周琇環、陳世宏，2000:378）

這裡特別凸顯了「官營事業」與「私人企業」的「特權」與「非特權」對比，除了維持「農工階級」弱勢代言人之外，再加上「反經濟特權」。1985年地方公職選舉，組黨前夕的最後一次黨外串連「黨外選舉後援會」提出共同政見，「中小企業」作為一個群體出現了。節錄其中有關經濟改革如下：

七、保障勞工權益，切實執行勞動法令。

十二、建立正確農業政策，保護農民收益。

十三、保障漁民海上作業安全及其收入。

十四、建立外匯存儲制度，保全人民財富。

十五、健全金融體系，保障中小企業融資機會。

十六、反對財閥壟斷；剷除官商勾結。

十七、整頓經濟秩序，肅清貪污，部長級以上官員應公布財產。

十八、裁撤虧損過鉅之公營事業。（周琇環、陳世宏，2000:513-514）

這次共同政見更加詳述了黨外對經濟改革的共同立場，反特權、反貪污、反財閥、挺農工、挺中小企業。

黨外雜誌的砲火則集中批判國民黨「黨庫通國庫」的黨國資本主義，而且「要把弱勢的中小企業輔導起來」。早在《美麗島》雜誌第3期裡就有刊登〈中小企業問題座談會紀錄〉在黨外雜誌的論述裡面。利用《慈林教育基金會典藏臺灣社運史料資料庫》查找黨外雜誌裡中小企業的形象，歸納出以下特徵：

- 一、中小企業處境困難：中小企業融資困難、利潤薄。
- 二、與國營企業「特權」的對比：中小企業負責人幾乎都是本省人，中小企業的苦難就是本省人的苦難，而這個苦難的來源就是黨國資本主義與外省統治菁英的結合。
- 三、中小企業需要被積極輔導：無論是中小企業的大型化、整併、或是融資都是政府政策應該支援的，而這些都是國民黨政府沒有做到的。

其中，尤以中小企業融資的部分著墨最深。因為當時的金融市場由國家所掌握，公營行庫的融資對於中小企業的資本額來說無法辦到。當時台灣的金融市場是「雙元金融市場」（吳泉源，1993），其一為政府所掌握的銀行系統，這些銀行主要融資對象是全國性的國營或民營大企業；另一為地方性金融，例如農漁會的信用部、地方信用合作社、以及最重要的私人融資方式：標會，地方性金融提供農漁民更優惠的貸款政策，而對於小資本額的中小企業來說，也是較容易取得融資的機構。相對於「雙元金融市場」，「雙元市場結構」恰好指的是國內市場呈現：內銷大企業、外銷中小企業的雙元經濟。黨國資本主義扶植的國營企業與本土大企業，藉由對於銀行系統的管制，被限縮在國內市場；而本省人中小企業藉由地方性融資的自由度，形成生產網絡，發展外銷。

黨外政治人物藉由黨外雜誌充分論述了「中小企業」在台灣社會中的位置，但這樣的經濟結構真的可以被拿來「構框(framing)」嗎？P1 在綠營以「專業財經立委」著稱，1989年當選增額立委後，一直連任立委直到1997年。期間擔任黨團幹部、也數次被評鑑列為「專業優秀立委」。他政治生涯中最主要的政治主張是：解除管制「經濟自由化」、「公營事業民營化」。這樣一個政治人物，在自身選舉時理應最有能力將「經濟結構不平等」構框，自詡為「經濟弱勢——中小企業」的代言人也不為過。但事實上，他是這麼評價民進黨與中小企業的關係的：

民進黨反對運動怎麼幫中小企業，你講得出來嗎？沒有嘛。因為我一開始就在民進黨選，中小企業怎麼幫忙？那時候是站在弱勢嘛，民進黨是幫助弱勢嘛。...（中略）...你在（選舉）競爭的時候他們要什麼？要大企業的勞工（的票）啊、要農民的（票）啊，所以你才會講

說糧食政策、肥料政策，還有政府補貼農民。什麼時候講中小企業？
沒有。⁴⁰

他認為政策上中小企業並不需要政府「幫」，政府想要幫忙也使不上力。可以做的就是解除經濟特權、改革稅制、鬆綁戒嚴時期的「戰略物資動員限制」，這樣做就可以了。P3 與 P10 也提到，在選舉場上沒有辦法論述「黨國資本主義」或是什麼中小企業融資問題，這也不是政見主張的重點。民進黨選戰的構框仍然圍繞在政治體制、省級認同等等，經濟問題不會是一個選戰的主題，更不會主打中小企業的權益。

由此可知，事實上民進黨並沒有以「經濟弱勢」為框架來動員中小企業群體。那麼，民進黨是以什麼框架打動潛在的資助者——中小企業呢？

貳、理念動員框架

黨外／民進黨政治人物回憶當年要怎麼打動支持者，不可能用「黨國資本主義」來鼓吹。傳統的政治動員框架仍然是最有用的，例如反特權、要求公職普選等等。P9 傳神的描述當時的情形：

中小企業會對政府不滿，（是認為）「這個政府不是開明的，不是服務型的政府，是在收紅包的」那時候氣氛是這樣子。那黨外開始打（這個議題）「你看紅包啊」大家就認為國民黨在收紅包。啊（另外）當然會想說「我們為什麼不能夠改選立法委員？國會要全面改選啦！」然後「為什麼台北市長不能選啊？」這個對他們來講「對啊，政府是民主啊。我們以前讀書的時候，教我們的是什麼？」「喔，哪有這樣都可以不選的」還有立法委員是從大陸來的，他遞補也是大陸去遞補。哇我們只要罵這些、講這些，喔！中小企業主就很爽。「啊要把他打倒！」啊我們就（選）上了。⁴¹

同樣，P10 也認為，中小企業主如果支持民主運動／民進黨也不會是基於「經濟理由」、不是某種利益、對價的關係：

我覺得那時候中小企業對民主運動的支持是沒有這種對價的。他基本上是基于理念、基于對於民主的期待，然後他也許會覺得：「啊我就沒辦法做（民主運動），你替我們來做。你們站在第一線，我們在第二線。你出力我出錢。」大概就是這樣子很……我會覺得都很簡單，沒有那麼深奧，說是什麼理論的結合。⁴²

⁴⁰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P1，台北市中山區，2019 年 08 月 04 日。

⁴¹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P9，新北市新店區，2019 年 09 月 11 日。

⁴²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P10，台北市中正區，2019 年 09 月 16 日。

而 P1 則指出一個重要的關鍵：個人的人脈關係加上理念的結合是資源動員的基礎。當時「民進黨」作為一個群體、以及「中小企業」作為一個群體的政治代言關係並沒有出現：

（民進黨）不是中小企業（作為一個群體）支持你，是我們多數中小企業的朋友、親戚、同學、跟各種社會關係搭在一起支持你。因為你是民進黨的民代，讓你有機會為民進黨發聲、為台灣發聲。他絕對不是說「中小企業有這樣的目標，所以（要求）自由出口、解除管制。」不是。因為不用你（民進黨來做），他們就這樣做了啊，你（民進黨）幫助他不多，非常不多。所以過去中小企業都是以「個人」跟企業主的關係。這種同學關係、親戚關係、或是各種社會關係的這種網絡是在首都，還有重要都會像高雄、台中、台南。這些就是親戚朋友有中小企業，都已經發展到行有餘力，可以三十、五十萬給你選舉。...（中略）...中小企業主來自於他們願意（支持）、來自於理念一樣，熱情為台灣幫忙。幫忙誰？不是民進黨（作為一個黨），是民進黨的公職人員（個人）。因為我選舉要錢，所以他們才會出錢，所以去演講人家才會丟錢。⁴³

由此可知，黨外／民進黨事實上沒有特別針對中小企業動員，而是「有很多支持者裡面恰巧是中小企業老闆」這些老闆不是因為生意上的原因支持民進黨，而是因為理念相同、或是有人脈關係而支持。同樣的推論也在下一章的內容，以中小企業的角度進行印證。

小結以上討論，我們可以回答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中小企業與民主運動的結合是「利益聯盟」還是「理念聯盟」？我們認為是「理念聯盟」。理由如下：

- 一、在民主運動的論述框架裡面，有關「利益聯盟」的「反黨國資本主義」是隱藏在政論雜誌裡、埋在政策白皮書裡的「艱深理論」。促進中小企業整體發展的論述，並不是民主運動主要的構框方向。
- 二、從政治菁英的角度來看，「中小企業主」這個群體的「票」不多，但是「資源（錢）」很多，所以效率最大化的選擇是：不必爭取「大多數」的中小企業支持，只要有穩定、足夠的中小企業主願意捐錢就夠了。

本文的研究方法採取口述訪談，研究限制為：若無長期的田野調查無法觀察出比較幽微的對價、代言關係。對於受訪者人脈關係中「利益導向」的方面，無法藉由幾次的深度訪談觀察出來。本文就「民主運動的論述」與「政治菁英的自述」作為研究資料，這些是「外顯」的資料，但我們也無法否定這些「外顯」的研究資料所呈顯的現象是「虛假的」社會關係。我們能夠證明的是：的確有一大部分的結合是「理念聯盟」，而這也是政治菁英構框的主要方向。

⁴³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P1，台北市中山區，2019 年 08 月 04 日。

第三節 小結



本章首先從民主運動的選舉收支、日常收支、以及組織化的資源動員探討民主運動／民進黨的收支狀況。接著分析反對政治菁英是如何進行資源動員構框，回答了本研究的第二個研究問題。總結以上兩個面向的討論，我們可以知道：一、民主運動的「帳本」可能會有什麼項目，其收支損益大概是什麼情況。二、反對菁英如何進行資源動員，以及他們怎麼思考經濟改革中的中小企業。為了更清楚論述以上兩個結論，以下將回答「民主運動缺錢嗎？」、以及探討「為何反對政治菁英不需花心思在動員資源？」

壹、民主運動缺錢嗎？

「民主運動缺錢嗎？」這個問題如果限縮成：「民進黨或黨外的選戰打完，會入不敷出嗎？」本研究認為「不會」。首先，黨外時期一直到 1990 年以前，是不缺錢的。P9 與 P10 說得非常明白：

黨外選舉不缺錢，我從來沒有聽過黨外選後還有負債（笑），幾乎沒有負債。因為靠這種民氣嘛，資源就會進來。⁴⁴

早期的反對運動裡面「人」比財務還要來得重要。當時的財務不會是個問題。⁴⁵

民進黨成立後到了 1994 年，台灣首次省長民選，也是民進黨成立以後選區最大的一次選戰，P1 擔任財務負責人，負責募款。他發明了「選舉兌換券」以及「不兌換券」來向選民「貸款」與募款，最後搭配《選罷法》的選舉補助款成功完成募款任務。而 1987 年擔任黨主席的 P11 則認為民進黨開始花大錢選舉是從第五任黨主席施明德開始的，當年陳文茜擔任民進黨文宣部主任，費了很多心思打 1996 年的總統選戰。（訪談編號 P11）本研究無法細究 1990 年代到底是從何時開始選舉變得花錢、收支有無達到平衡等等問題，都需要後續更深入的研究。

本研究能夠肯定的是：談到黨外時期、以及民進黨成立前幾年，受訪者們一致認同「那是一個不需要煩惱錢的年代。」而深究為何當年不需要花什麼錢？第一，花費最鉅的是人事費，但黨外幾乎都用志工。第二，加上金額不多但積沙成塔的小額捐款，讓收支至少打平。這代表著：民主運動的收支打平，靠的是人民的支持，是對於民主理念的支持。這也回應了本研究對於「理念聯盟」的預測，其實不止中小企業老闆的金錢支持是「理念聯盟」，當競選志工

⁴⁴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P9，新北市新店區，2019 年 09 月 11 日。

⁴⁵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P10，台北市中正區，2019 年 09 月 16 日。

發傳單的年輕學生、在服務處煮菜請大家吃的阿姨、送來一整隻豬的肉攤老闆，這些人力、物力資源其實也都是「理念聯盟」的一環。



貳、為何反對運動的政治菁英不需花心思在動員資源？

大多數的政治菁英受訪者都認為當年不太需要煩惱錢的事情。為什麼？可能可以從政治菁英「對於經濟的態度」與「自身的經濟行為」之間的隔閡觀察。本章第二節整理了黨外雜誌文章與黨外共同政見，發現民主運動對「經濟改革」還是有一些看法的，只是這些看法「脫離群眾」。怎麼說呢？因為他們沒有將這些看法轉化為具體的運動目標，再以這些目標去動員人、動員資源。他們動員人（選票）與動員資源（錢）的框架是一樣的，並沒有因為目標群眾有可能是「會受到經濟改革而受益的」中小企業主而轉換他們的論述框架。亦即他們只要講同一套打倒老法統、反國民黨特權，金錢、選票就會進來，不需要特別去「資源動員」。

那麼為什麼「理念框架」會比「利益框架」有用呢？許多人都提到這是「民心項背」的問題，P6 認為民主運動組成新政黨，帶給許多人新希望，而 P9、P10 也認為無論對手（國民黨）再有錢，黨外／民進黨靠的不是錢，而是理念：

當時黨外以他的民氣，希望政治民主化，人民有期待。我覺得黨外時代沒有所謂的金援，經濟人脈，沒有，當時黨外真的沒有。⁴⁶

沒有對價關係的政商關係，這是一個理想的年代。所以吳乃德（2020）才說 1979 年到 1987 年是「台灣最好的時刻」。然而我認為這個「最好的時刻」應該還要超過 1987 年，再持續個幾年。

翻開民主運動的帳本，裡面滿載著台灣人民對於民主的想望。台灣人不喜歡談錢，但台灣人總是喜歡包紅包，婚宴喜慶包紅包、過年過節包紅包。每當台灣人無法用言語好好表達好意、關愛、支持時，台灣人就會包紅包，素樸的新台幣鈔票上面印的「壹千圓」彷彿就是最好的「加油！」標語，溫暖每一個收到紅包的人。

⁴⁶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P10，台北市中正區，2019 年 09 月 16 日。

第四章 為民主投資



本章我們將認識四位「為民主投資」的中小企業頭家（老闆），他們在幕後長期支持民主運動，但與現在我們所能讀到的民主運動的故事不一樣。台灣民主轉型的故事有好多種訴說的方向：第一，認為威權執政當局的「放權」與「本土化」是民主化的核心故事，著重在蔣經國、國民黨的動向。第二，以黨外民主運動對抗威權的英雄故事為核心，描述這些英雄面對黨國的血腥鎮壓仍然不屈不撓，最後終於實現民主化。第三，以黨外民主運動的「底層參與者」為重心，這些「沒有歷史的人」在街頭運動流血流汗，卻在民主轉型過後被遺忘、棄置一旁。（何孟樺，2016）

本章的故事是中小企業老闆「為民主投資」的故事，他們不是反抗威權的民主英雄、也不是在街頭流血流汗的「小人物」，更不是威權政府的高官。沒有英雄那麼偉大，也沒有小人物那麼悲壯，他們就是一群以「頭家島」著稱的台灣島上的「頭家」，以自己的方式支持民主運動。本章將分別探討這些中小企業主「為何」捐錢、「如和」捐錢、以捐給「誰」，再次探究本研究的第二個問題：中小企業與民主運動為何結盟？

第一節 為何而捐？台灣中小企業主的民

主意識啟蒙

為何而捐？本章的四位中小企業老闆受訪者的生命經歷都不盡相同，答案都不同。當然，台灣成千上百位的頭家經歷也都不同。但是我們從訪談中歸納出了幾個經驗，是比較普遍或典型的「民主啟蒙」的過程。與本研究多數政治菁英受訪者不同，這些中小企業老闆並沒有在人生的初期就決定要「睬政治⁴⁷」，四位中有三位，他們的政治傾向都是在出社會工作後比較清楚。而這些政治傾向除了與工作經驗相關，也與「見世面」之後的人脈拓展有關。以下整理出三種典型或普遍的政治社會化人生經驗：社會互動與政治經驗、出國經驗、家族（宗教）經驗

⁴⁷ tshap tsing tī。意指關心政治、參與政治。

壹、社會互動與政治經驗

社會互動的長期累積，是政治（再）社會化的關鍵。為何捐錢？S3 的啟蒙案例主要展現在「工作經驗」、S1 與 S4 的經驗則展現在「人脈拓展」。

許多受訪者都有與國民黨政府打交道而感受到「政府特權」，進而產生反感的經驗。在彰化從事小五金製造業的 S3 印象最為深刻的也是所謂「特權企業」壟斷市場。他以自身工廠製程必需用到的某化學品項原料為例，指出 1980 年代該化學原料被「特權企業」壟斷，而且居然還賣給違法工廠：

他們（該化學原料）本來是進口嘛，進口可能有一定的價格，可是自從他們生產以後...（中略）...全台灣就只有他能賣。他是外銷的三倍價錢，而且非法的工廠、沒有執照的工廠還是可以買，（非法工廠買的話）大概超過三倍價錢。...（中略）...你知道那是蔣家的那個（企業），那些特權的第二代做的事業。⁴⁸

他說這個品項的價格在該「特權企業」自行生產後，售價居然變成原本進口原料售價的三倍。而原因是這個原料屬於動員戡亂時期的「戰略物資」，依照當時的物資動員規定，政府有權力介入管理這些原料。他說這些「商場八卦」都是做生意做久了才會從同行中得知的，久了就會知道「特權」是長什麼樣，以及為什麼某些原料工廠可以壟斷，穩賺不賠。算是一種「做中學」的「政治啟蒙經驗」。

S4 的經驗十分特殊，他是頂尖大學政治系畢業，學生時期曾參與系上國民黨「知青黨部」的運作。大學畢業後，服役時被選進警備總部「政治作戰連」執行「文化檢查」，也就是查扣禁書、黨外雜誌，他自稱當時是「執行白色恐怖」的。⁴⁹退伍 S4 打算接掌父業後，但由於當時他父親的工廠是做「鈴鐺」為主，所以他必須先在職訓中心培養工科技能。與此同時，他也加入中部的青商會組織拓展人脈。加入青商會的這個決定，開啟了 S4 的政治人生。

一個青商會的（朋友）他就招我「走，我們去姚嘉文那邊幫他助選」，他招我去那邊，跟姚嘉文、周清玉認識。認識之後，那是我以前查禁的對象欸，對不對？所以我會好奇啊，我去那邊（警總），我不是（對民進黨）恨之入骨嘛，我不是那種主動的自願的嘛，我是被動被選去的嘛。我去了之後，開始去在那邊，每天晚上在那邊唱歌、小型座談，啊聽一聽就覺得很有趣。...（中略）...那時候（1989 年）我當他（周清玉）的司機，好幾個月，所以那段時間他們去找什麼

⁴⁸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S3，彰化縣彰化市，2019 年 08 月 29 日。

⁴⁹ 目前對於查扣黨外雜誌、禁書的「鬥智」故事有記錄下的比較偏向「守方」也就是黨外雜誌這邊的紀錄，對於「攻方」的警總、文化警察較少出現口述記錄。這位後來成為民進黨死忠支持者的 S4 先生的故事十分值得深究。

人、去拜訪什麼我都知道。啊所以我發覺他跟我以前講的，我們讀書（的時候教的）三合一敵人什麼，不是啊！他們都是在講台灣人啊，啊國民黨怎樣霸權嘛。...（中略）...啊發覺說，跟我以前受的教育，（民進黨）不是那麼十惡不赦的壞人嘛，也不是說要顛倒治安、破壞台灣和諧、搗亂，不是嘛，（他們是）為台灣打拼嘛，爭取人權嘛。

50

S4 後來在周清玉選舉過後順利接下父業，利用既有的金屬沖床技術精緻化後，進行產業升級，現在主要在做汽機車改裝零件。而他也長期投入民進黨，1990年代在地方黨部曾擔任幹部。他認為他在出社會以前的經驗是「被國民黨洗腦洗壞了」，認識姚嘉文等人後才開了眼界。

S1 的經驗也是圍繞著人脈關係成長。1980 年代初期，藉由朋友介紹，他認識了幾位彰化地方政治圈的朋友，踏入政治界，而後也參與過國民黨地方派系的運作。他對當年地方派系運作的回憶：

我也有涉入國民黨裡面啊，買票。我親戚也有人選議員啊，我也在替他買票啊...（中略）...我甚至於有的朋友，我拿錢幫他助選省議員，國民黨的喔。他在選的時候我都有參與，一起開會，他第一個考慮的是什麼呢？「選這個會賺嗎」這很重要啦。...（中略）...我都有參加他們，（甚至連我自己）要選、不選在考慮喔，甚至於家庭會議我都參加得到。在算（選舉）到底會不會賺，會虧就不要選啦。所以這就是說，（開始覺得）政治給國民黨這樣不行啦，為了要賺錢而已。⁵¹

1980 年代初期幾年彰化地方派系鬥爭激烈，他看透了國民黨政治人物買票賄選、為了派系利益明爭暗鬥，漸漸的不認同國民黨。1985 年他轉而北上成立公司，遠離地方政治鬥爭。在台北，他漸漸接觸到民進黨，開始認同民主理念，而後成為彰化縣民進黨的重要支持者，甚至在 1990 年代成為民進黨政治人物「地下電台」的資助者。

貳、出國經驗

台灣的中小企業主有一個共同的經歷是：要出國很麻煩。中小企業老闆是「拿著 007 皮箱跟全世界做生意」，同時也有很多經驗是要出國學習先進技術，相比於一般中產階級有著比較高的跨國移動需求。但是由於戒嚴體制，出入境管理非常複雜且嚴格。S2 是台灣工業「橡膠界」元老級人物，早在 1968 年即赴日學習橡膠工業技術。（S2 口述，2019）他敘述到當年赴日學習的經驗：

⁵⁰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S4，彰化縣花壇鄉，2019 年 08 月 29 日。

⁵¹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S1，彰化縣彰化市，2019 年 08 月 16 日。

我要去日本，那個日本公會（提供機會）正正當當要去日本。（出國前要）過四關，我對國民黨討厭（從這裡開始）。第一關，警察，給你寫「無不良嗜好」，一千塊，收一千塊紅包。...（中略）...之後，縣政府的人事課，又一千。然後出入境管理處又一千。...（中略）...最後，內政部核准公文之後，會發出入境證，要有那個證才能夠出國啊。那個又一千。...（中略）...所以那時候我就對國民黨很討厭，這政府就是貪污啊、歪哥（uai-ko）⁵²啊，對他們就沒好感。⁵³

戒嚴體制的嚴格控制，卻使得政府官員能夠從中貪污，反而讓民眾反感，甚至成為「政治啟蒙」投入反對運動。S4 也分析到相似的經驗：

我記得我父親第一次要出國，他不知道去弄什麼，社團，還是去掛一個什麼，（才能）出國，那時候出國要去申請「你要出國要幹什麼」，要有原因，國際社團交流還什麼之類，才可以出國。啊當然這對中小企業做生意來說，非常不方便。所以那時候出國很不方便，那時候台灣是外銷導向，所以都要出國。所以這些中小企業比一般譬如說務農的，農民會反國民黨，主要是因為是社會底層，所以他們累積了很多生活上的不滿。但是中小企業會不滿，是因為他常常做生意在接外銷訂單，他看多了、知道多了，知道那是不對的，因為他見識很廣，所以他知道這個不對。⁵⁴

除了出國本身的手續麻煩、容易被刁難之外，S4 提到的「見多識廣」也是關鍵原因。中小企業主的確會比其他職業類別更需要出國，而這種交流經驗會產生比較心理。

參、家族（宗教）經驗

S2 的啟蒙經驗是從小參加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開始的，家族的信仰是長老教會，而長老教會從 1970 年代開始即具有反抗威權的傳統。S2 隨著事業發展、年紀增長，信仰越篤。因為經營企業、又熱心公益，S2 擔任長老教會地方教會的「社會服務部長」。擔任教會幹部期間，恰好遇到台灣街頭運動最盛，長老教會上街抗議最勤的一段時間。身為教會幹部的 S2 除了對於自身信仰更加堅定外，對於政治的意識也愈加鞏固。

⁵² 意指「貪污」。

⁵³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S2，彰化縣員林市，2019 年 08 月 26 日。

⁵⁴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S4，彰化縣花壇鄉，2019 年 08 月 29 日。

肆、小結

從以上四位中小企業老闆的生命經驗來看，他們的政治社會化經驗其實更符合 Lipset (1960) 以及 Inglehart (1977) 的「現代化理論」對於中產階級的描述：中產階級隨著工業化發展，理念邁向「後物質主義」發展。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教育經驗形塑了初期的政治意識，但是由於他們的職涯發展，成為中小企業老闆、成為中產階級，讓他的社會網絡發生變化。而這個以商業為中心的新的社會網絡，轉變、且鞏固了他們後來的政治意識，成為死忠的民主運動／民進黨支持者。在此有回應了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反對運動與中小企業的結盟是「利益聯盟」還是「理念聯盟」？由這些生命經驗來看，算是對於民主價值（或本土意識）的共同「理念聯盟」。

第二節 捐錢實況：自發性動員、阻撓與 應對

這些民主運動的支持者們，在訪談中透露了許多當年如何捐錢給民主運動／民進黨的經驗，甚至出現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形式。同時，他們也透露了他們如何與威權政府應對、逃避政府有可能對他們清算。

時至今日仍令 S3 津津樂道的是他當「民主標會」的「會頭仔」的經驗，其實就是自發性的當作募款代理人：

我比較有趣的是我會跟客戶募款，我舉個例子像是呂秀蓮那個例子，她（呂秀蓮）說，「啊？彰化？」他以為彰化是鄉下，當然他跟台北比吧...（中略）...因為他收到錢他說「怎麼可能？」...（中略）...我跟他列了超過十幾二十個名字，其實我是募到他嚇一跳啦！好幾萬就對了，但是他認為怎麼可能啊？我就說「我們的客戶啊」我是這樣啦，就是原則上老闆五百、一千，你如果是業務員、上班族，那就一百、兩百、三百都可以。就是我會找朋友，那我就收一收。⁵⁵

1996 年，呂秀蓮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的運動，但是反應並不熱烈，S3 熱心的為他募了很多款，甚至還親自去地方國代的服務處拿海報來貼。他認為在商場上不一定會談政治，但是如果政治談得來的人，就會變成好朋友，而這些好朋友也會互相影響，一起捐錢、跑選舉、跑街頭運動等等。

⁵⁵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S3，彰化縣彰化市，2019 年 08 月 29 日。

S1 除了第一章提到的認捐謝聰敏服務處之外，與 S4 有同樣的經驗是資助政治人物創辦「地下電台」。1990 年代，泛綠陣營亟欲在媒體言論市場打破國民黨優勢的生態，因此許多政治人物相繼在地方開設廣播電台。但由於廣播功率頻譜有限，欲開台必須向新聞局申請，這些（尚）未申請的電台於是成為非法的「地下電台」。1993 年，周清玉連任彰化縣長失利後，投入 1994 年省議員選舉，當時他也想藉由廣播電台的力量增加言論曝光、拉抬選情。S4 回憶到當時的情形：

電台要有什麼，要有發報器，然後你裡面要有音控設備，對不對？這些設備要花錢，她就找我，她那時候總共前後找了五個人，她本身花了多少我就不知道。招了五個，那時候我記得我們一個人花了二十萬，五個人湊了一百萬，他們（周清玉、姚嘉文）夫妻自己湊了多少就不知道。所以我們在八卦山就有一個秘密的地方，我們也不可以讓人知道喔，就去設一個。⁵⁶

設立好機器設備才是開始，營運一個電台需要人力資源，S1 在地下電台「大彰化之聲」甚至親自出馬擔任主持，往返台北的公司以及彰化的電台，出錢又出力。但是地下電台隨時面臨被「抄台」的危險，S4 就回憶到當年地下電台「關懷電台」如何躲避追查：

抄台就是什麼？他不知道你基地台在哪裡，但是你的音控室在哪裡他會知道嘛。你人在哪裡發聲，你人會出出入入。基地台你人都不用去嘛，你一個森林裡面設一支在那裡沒有人知道嘛。但你進去（音控室）你會邀請人來講話對不對？他一定會知道。啊他的音控室設在服務處，彰化國中對面那邊，四棟透天的四樓，我們每天都去那裡輪流排班。⁵⁷

排班如果有風聲來「抄台」就趕快把設備全部搬上車，等警察撲空之後再架設回去。1995 年，周清玉、姚嘉文的「關懷廣播電台」合法申請通過，S4 也順理成章成為股東，營運至今。

捐錢給黨外「危險」嗎？如同第二章許多政治人物受訪者說的，黨外時期「政治氣壓很低」（訪談編號 P6），看到黨外份子像是看到「瘟神」（訪談編號 P4），中小企業老闆如要捐錢，必須要小心翼翼。但是再怎麼低調，總會有遇到被找麻煩的時候。S2 就有疑似被「抓扒仔」⁵⁸舉報逃漏稅的經驗：

我到現在還不知道是國民黨騷擾，還是調查站，來騷擾，差不多三十年前。就不知道他去探聽到我有賺錢，還是有我參加一些街頭運動還是什麼，我不知道。他就來說我逃漏稅。比如說發票開多少，啊實際多少，類似這種。...（中略）...我那時候也沒有什麼人教我要怎麼逃

⁵⁶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S4，彰化縣花壇鄉，2019 年 08 月 29 日。

⁵⁷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S4，彰化縣花壇鄉，2019 年 08 月 29 日。

⁵⁸ jiàu-pê-á。意指告密者。

稅，也都沒有啊，只是小姐（員工）在做啊。之前是有一個 X 小姐在做，那個 X 小姐，他的親戚，之後我才知道說是調查站（的人），所以有可能是這條線。一般如果有去上報，就有回饋，不然記功、升官，有這個事情發生。...（中略）...調查站把我問到差不多三四點鐘，算還好啦，啊十一點半我開車回來，沒有說沒天沒夜輪流（拷問）。「你如果說了大家都沒事情，我們交差這樣就好啦」就會這樣跟你講啦，就是這樣讓你睡不著，電燈開得亮亮亮這樣。啊我是還好啦，沒什麼嚴重。⁵⁹

後來 S2 上法院解決了這件事，但是過程中又遇到司法人員收賄，使得他對於政府更加不信任。

但是，事實上像 S2 直接被查稅的情形在本研究的訪談裡算是少數。多數的老闆都表示自己非常低調，沒有被政府刁難過。例如做航運業的 S1 說到：不是說隨便刁難就可以刁難的啦。不會啦，你那個法令的適用你要知道，他也知道啦。你如果做國內內銷的他就有機會刁難你了，因為那個都要稅啊。我們外銷的東西都免稅啊，免稅我們不必逃稅啊。⁶⁰而同樣做外銷的 S4 也是同樣的經驗：

「因為中小企業不能生存、不能發展，就去反政府？」我個人的經驗比較不是這樣，因為我的事業沒有受到這種影響，可以說沒有啦。...（中略）...啊因為我的東西（汽機車改裝零件）很多是外銷，我的產業是外銷導向，我的東西百分之七、八十都外銷，所以我不會去受政府的限制。（問：原料呢？原料不會被你剛剛講得這些特權產業給把持？那就會受他們的控制？）也不會，也沒有碰到，我的原料就是金屬類、鐵類、銅類，也不曾碰到。說我的供應商，「你這民進黨的，我不要賣你」，其實我也沒碰到，啊也沒有受到公權力來干擾。⁶¹

S3 也同樣表示政府不會對「偏綠」的企業差別待遇，沒有遇過政府來找麻煩。但必須注意的是：本研究的樣本數只有這四位中小企業老闆，尤其其中三位在商場活躍的時間是 1985 年以後，只有 S2 從 1970 年代就在商場打滾。一來，樣本數不足，二來，1985 年以後的政治氣氛開始緩解，並沒有美麗島事件前後的肅殺，早期也許有更多的案例，本研究暫無法下定論。

但是本研究可以推敲的是：警備總部的裁撤、以及刑法一百條叛亂罪的修正，都是直到 1992 年才完成。這表示在威權政體的末期 1985 年至 1992 年，這些「神經末梢」已經失靈了，國民黨的社會控制正在瓦解，對於社會各個階層、社團、當然包括中小企業的監視都在減弱，本研究的資料可以作為印證。我們可以說，中小企業群體一直是「沒有什麼政治敏感性」的，他們並不會直

⁵⁹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S2，彰化縣員林市，2019 年 08 月 26 日。

⁶⁰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S1，彰化縣彰化市，2019 年 08 月 16 日。

⁶¹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S4，彰化縣花壇鄉，2019 年 08 月 29 日。

接威脅到威權政體的存續。中小企業作為一個政治化的群體，直到 1990 年代末期才出現。



第三節 捐給誰？理念還是關係？

理解了中小企業主「為何」而捐錢、以及「如何」捐錢之後，我們想要知道他們是如何選擇要捐錢給「誰」？這個問題的解答可以進一步讓我們知道：民主運動中到底是「關係」重要，還是「理念」重要？以及理念與關係的交互作用是什麼？事實上，四位受訪者的經驗都有包含「關係」及「理念」的融合，只是先後順序不同而已。S1、S2、S3 三位是先有理念啟蒙，才有人脈建立，而 S4 是先有人脈關係，才有理念轉變。

第二章提到 S1 與友人合力資助謝聰敏的故事，令人好奇他們是如何建立深厚的關係。謝聰敏是彰化二林人，1964 年與彭明敏、魏廷朝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後成為政治犯，幾經波折 1979 年後逃往海外成為「黑名單」直到 1988 年才回到台灣。1991 年，謝聰敏決定回二林參選國大代表，但此時的謝聰敏已遠離地方上的人脈關係，選舉並不輕鬆。恰好 S1 主持的地下電台「大彰化之聲」，因此他們於廣播節目中結識。在他們相識前，S1 早已讀過許多謝聰敏的資料，極為欽佩謝聰敏的膽試，果然一拍即合。（訪談編號 S1）S1 與謝聰敏的案例顯示，他們的結識不是因為「關係」，例如同學、親戚、同鄉，而是因為在電台節目上認識。是因為 S1 先有了民主「理念」的轉變，才有地下電台，也才有後來與謝的相識。同樣地，S3 的經驗也是先有「理念」才有捐款，他曾經捐獻給無數個民進黨政治人物，包括 1994 省年長選舉的陳定南、1998 年高雄市長選舉的謝長廷、1999 年總統選舉的陳水扁、以及上文提到的呂秀蓮。他認為支持民進黨是一種理念的堅持，但是要選裡面「新的、好的、年輕的」政治人物（訪談編號 S3）。他不是某某人的固定金主，但卻是許多政治人物「剛出道」時雪中送炭的那個人。

那麼，傳統的社會關係在民主運動、民進黨的資源動員中扮演什麼角色？S4 藉由青商會的人脈關係認識姚嘉文進而產生理念轉變，後續更成為重要的資助者，這是一個經典的「社會關係」案例。另外，當研究者詢問 S2 認不認識民進黨某前縣長，有沒有資助他時，他這麼說：

（問：那比如說以前 XXX 選縣長、或 OOO 選，董事長您會不會因為不太認識他們就沒有，比較沒有去接觸？）你也知道不認識。啊真的是吼，他們這兩個喔，實在是，做官的機會也很多。我在做（長老教會）社會服務部長的時候，XXX 在做縣長，他來教會，我拿一本聖經送給他，啊他不記得了，所以他要選的時候也沒想到說要來找我。啊

不過，他的服務處的人就會找我，說要幫忙捐一些，我說好啊，一樣都是民主運動，啊在野黨給他支持，比較少啦。⁶²

「認識、不認識」理所當然地成為捐獻多寡的關鍵。社會關係在資源動員中仍然佔了重要的角色。同樣的，S1 與謝聰敏的關係，我們也可以理解成：因為「謝聰敏回彰化選舉」的地緣關係，才讓彰化人 S1 與謝聰敏結識，不然 S1 也有可能成為任何一個彰化民進黨政治人物的資助者。

因而，我們可以理解到：民主運動的資源動員中，理念動員、關係動員都很重要。有的人是先靠關係動員進而轉變理念，最後成為資助者，例如 S4。而有的人是在差不多理念框架中（民主運動、民進黨）挑選關係比較近的成為資助者，例如 S2。亦即：民主運動／民進黨的資助者裡面，都必須經過理念的轉變、理念的動員，沒有單靠關係動員的案例。顯示「關係」雖然在民主運動的資源動員中佔有重要地位，但是「理念」仍然是最重要的關鍵。

第四節 政治參與與經濟活動的關係

對於這些中小企業主，他們並不像民主運動中的政治菁英，把生涯都投入政治事業；他們也不像所謂「底層參與者」是個接近一無所有的普通勞動階級。他們的生涯仍然以他們自己的事業、自己的公司為主，縱使很熱衷於政治，但始終不是候選人、或是在街頭的「衝組」。他們認為自己的參與很「微不足道」，因為捐獻的這些錢都是「小錢」（而事實上這些金額確實也不比大企業老闆的出手），但他們的不求回報、雪中送炭，確實是台灣民主運動史中不可抹滅的一章。

那麼這些熱衷於民主運動的頭家們，他們的政治活動到底對於他們自己的生意有沒有什麼影響呢？他們平常的客戶、往來的銀行、上游協力廠商對於這些「睬政治」的頭家們會不會青眼相待？首先，對於銀行融資問題，四位受訪者都認為在與金融機構往來、借貸時沒有遇過刁難。S1 很清楚的表示：

（問：大哥的公司以前有被銀行刁難過嗎？）不會啦，銀行比較沒有啦。我們的銀行，我說實在，作業都還滿獨立的。他們的政治是跟公立銀行，冒貸一些、超貸一些案這樣而已。但是銀行，他是民營企業吼，他倒是不會管你啦。啊也不會刁難你啦，他要做生意啊，你要貸款他要做啊。⁶³

所謂跟公立銀行超貸、冒貸的事，S1 隨後就講了一個當年在商場聽到的故事：彰化縣某省議員欲在台灣銀行的某分行要做低價抵押、違法超貸，該分行的行

⁶²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S2，彰化縣員林市，2019 年 08 月 26 日。

⁶³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S1，彰化縣彰化市，2019 年 08 月 16 日。

員十分為難，跟這位議員周旋許久，驚動了該行經理出面。經理說「議座，您的事情本行十分樂意幫您處理。我幫您聯絡一下霧峰分行，也請您移駕到霧峰，我請他們經理招待您。」原來省議員的超貸都是由霧峰分行負責做，其他分行沒有辦理權限。該議員於是找上霧峰分行，最後還真的順利給他貸款到了。（訪談編號 S1）

而對於客戶，除了像 S3 會主動向客戶募款之外，其他三位很明確地說「不會跟客戶談政治」生意也幾乎都不會受他們的政治活動影響。甚至連 S3 都是這麼描述他的政治參與與生意的關係：

「因為知道你是支持民進黨或是黨外，然後不跟你來往」（這樣的情況）好像幾乎沒有。...（中略）...因為我們客戶很明顯有支持國民黨的，很明顯。我們也都是生意歸生意啊，真的大家都是，也沒有把它算得比較貴啊、或是不理他。應該不會、很少，都不會，大家這方面不會。反而就是談得來的客戶或朋友會變多，上下游，或者你的同業。譬如說你趕貨來不及請他幫忙，或他請你幫忙。...（中略）...就是大家感情會更好、更有默契。但是不會因為說因為你支持藍的或國民黨，然後大家就感情不好、或者影響到工作、生意，好像不會。但是有可能你要買東西的時候，你會特別跟比較好的買，他也好商量啊，譬如說價格啊、譬如說趕快給你，會成為好朋友。⁶⁴

這說明了台灣中小企業的「協力生產網絡」是「去政治化」的，各自雖然都有政治傾向，但這些都不是這個網絡的核心目的。「協力生產網絡」的目的還是經濟生產、外銷獲利。而這四位受訪者有都在訪談中提到他們「藍綠都有朋友」，因為在商場「做人比政治重要」。自己的政治立場只跟志同道合的人分享即可，在商場就只是看這個老闆會不會做事、做人而已，無關乎個人的政治參與。

第五節 小結：威權體制鬆動與「結構性

缺口」

經由本章的討論，我們再次確認了兩個研究問題的解答：一、中小企業與民主運動、民進黨有形成一個「社會聯盟」。二、這個聯盟的組成因素是「理念聯盟」為主。而在上一章較未提及的是「社會關係」這個因素的加入，對於民主運動政治菁英來講，也許他只要「主打」某個運動、某個理念，他的追隨

⁶⁴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S3，彰化縣彰化市，2019 年 08 月 29 日。

者就會「自動地」出現，不太需要資源動員。但是對於被動員者來說，可以捐獻的資源（金錢）是有限的，選擇要捐給誰就會是一個問題。例如 S4 的經驗顯示：「社會關係」的有無，其實也會影響潛在被動員者的政治意識。而 S2 的經驗則顯示了：「社會關係」親疏遠近，也會影響資助者捐獻的數量多寡。這說明了，在以「理念」為主的民主運動中，「社會關係」仍然佔有重要地位。

另外，值得再追問的是：既然中小企業是民主運動的重要力量之一，那麼為什麼威權政府對於中小企業的控制在本研究的資料中看似薄弱？當然其中一個理由是本研究的研究限制：只有四個受訪者，而且其中三位在商業領域活躍的時間都在 1985 年以後。但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因素是，這可能是威權政體裡的「結構性缺口」。當這個威權政體恰巧採取發展型國家政策時，經濟發展要借助國家官僚與民間企業的協力，而這些民間企業在政治上小到無法威脅威權政體。或者說，在經濟政策上，國家根本沒有把他們納入政策藍圖中，如此一來國家官僚就放任這些中小企業不管了。但事實上這些企業雖小，但卻可以提供政治反對勢力足夠的經濟資源，用以資助對抗威權的民主運動，形成了發展型國家－威權政體的「結構性缺口」。這個結構性的缺口很有可能會是民主轉型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這樣的「結構性缺口」理論，也能解釋為什麼不是「作為一個群體的中小企業」支持「作為一個群體的民主運動」，而是「個別的」中小企業支持「個別的」民主運動政治菁英。就算中小企業群體「大多數」都支持民主運動，他們也沒有形成一個集體的政治力量，仍然是零散的支持。這個「結構性缺口」是讓這些中小企業主有個別的政治自由，讓他們可以自由選擇賺取的利潤要花在哪。由於這個「缺口」，就算錢花在反對運動，威權政體的控制並不知道，且無法阻止。但這不自然地代表著大多數中小企業主都會支持民主運動，他們之所以會支持民主運動仍然如本章第一節所談的「理念」以及「人脈」。但這個「結構性缺口」讓中小企業主「資助民主運動的政治行為」得以執行，他們是社會中所有群體裡，除了政治菁英本身以外，唯一有足夠的資源（金錢）而且又有可能將「資助」付諸實現的一群人。套用社會運動理論，這就是為什麼中小企業與民主運動得以結合的「政治機會結構」。

第五章 結論



本文討論了兩個研究問題：一、民主運動與中小企業有沒有結合成為「社會聯盟」？二、此「社會聯盟」是「理論聯盟」還是「利益聯盟」？而經由第二到四章的討論，我們已經可以回答這兩個問題。一、民主運動與中小企業有結合成為「社會聯盟」，但並不是中小企業作為一個群體與民主運動的聯盟，而是個別且分散的結盟。二、他們的結合是理念聯盟，不是利益聯盟。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理念之外，「社會關係」也在這個社會聯盟中扮演重要角色。在理論對話上，本文試圖與民主化理論與發展型國家理論對話，以下將分別論述。

第一節 與民主化理論對話

本文主要的理論貢獻在於試圖補足民主化理論中結構論的「結構－行動」(Haggard,2016)論述。結構論長久以來都只有大型的量化研究，試圖證明「民主轉型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但這些研究只能說明結構論中「經濟結構」與「政治轉型」的關聯性而已，並無法點出其中扣下板機 (trigger)的關鍵機制 (mechanism)。本研究提出了與民主化理論中制度論不一樣的機制，制度論對於「結構－行動」的論述是在於「政治菁英互動論」，然而本研究關注的是政治菁英與社會大眾的「縱向互動」，而不是政治菁英之間的「橫向互動」。同時，本研究也直接面對了結構論中「經濟發展如何促進民主化」的這個問題，我們提出的機制（故事）是：台灣的經濟發展是以中小企業作為主體，而這些中小企業主之中有許多成為民主運動的資助者，最後民主運動成功扳倒威權，達到民主轉型。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從台灣的案例來看，活躍而自由的中小企業群體是經濟發展導致民主轉型的重要機制。另外，可以深入探究的尚有兩點，第一點是有關於「理念聯盟」與「利益聯盟」的討論；第二點是有關於第四章所提出的「威權政體的結構性缺口」。

第一，在民主化理論的結構論內部，我們確認了推動民主轉型的社會聯盟是如 Inglehart (1977)所說的「後物質主義理念變遷」（理念聯盟）而非 Moore (1993)所說的「階級鬥爭」（利益聯盟），並且加入了台灣本土的「關係」元素 (Jacobs,2008)。本文透過質化訪談，使得「結盟」的原因有了一個清晰的圖像，同時也再次確認了台灣本土「現代化」的過程中「後物質變遷」、「階級政治」、與「社會關係」的角色：台灣的民主轉型主要透過大眾的後物質主義

的理念變遷，而非階級鬥爭達成，同時，理念的變遷還要再加上「社會關係」的有無、親疏，才能結成一個推動轉型的聯盟。

第二，我們在第四章提出了「威權政體的結構性缺口」，我們認為這是中小企業能夠與民主運動結合的「政治機會結構」。這個概念回應了一些探討「威權鞏固」的重要研究問題：獨裁者的資源有限，再怎麼綿密的社會監控都會有漏洞，那麼獨裁者是如何挑選需要「加倍監控」的對象呢？本研究指出，從台灣的案例來看，威權政體的監控重點是政治菁英及其親友，以及會在街頭運動拋頭露面的激情支持者，幕後的支持者例如一些中小企業主不會被嚴密控制。這些中小企業主扮演著重要資源提供者的角色，威權政府卻疏於控制，使得政治反對勢力得以獲得金援，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威權政體的結構性缺口」。至於為什麼是「結構性」的缺口，這就與「發展型國家」有關了。

第二節 與發展型國家理論對話

發展型國家理論認為官僚體制在經濟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在台灣的案例中，政府掌握了原料高地被批評為黨國資本主義，這些掌握原料官營企業卻不排擠民間企業，使得下游製造業有許多中、小型企業。在官僚主導的經濟政策之下，企業需要與政府協力發展經濟，形成一種「鑲嵌的自主性」(Evans,1995)，因而在經濟上官—民必須是合作的、協力的。在這樣的關係下，經濟政策持續保持著「經濟專業」，亦即經濟官僚沒有政治化、沒有政治考量。同樣的，民間企業在與政府互動時也是去政治化的。唯有這樣，發展型國家的經濟政策才能維持專業性，而不是基於利益政治的考量。在這樣的背景下，民間企業在「經濟政策」下是協力的對象，而在威權體制的政治控制底下，他只是微不足道的「普通市民」。因此，這些企業主只要不要太「招搖」、「衝組」，自然不會被威權政府「特別招待」。這就形成了一個「結構性」的政治自由，這些中小企業主的政治自由不同於普通勞動階級的政治自由，勞動階級只能選擇要不要上街頭、要投票給誰而已，這些「頭家」還可以選擇捐錢。這就形成了一個「結構性」的威權缺口。亦即威權政體兼具發展型國家政策，會鼓勵這些企業的存在，卻沒有意識到這些企業會成為潛在的威權政權威脅者。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研究展望

關於研究限制。第一，本文的 17 位受訪者全部都是男性。當然，台灣的反對運動與中小企業主都是非常「陽剛」的群體，但是反對運動中不乏女性的領導者，而有關中小企業的研究也提出了「頭家娘」在中小企業中的重要地位（高承恕，1999）。第二，本文的「中小企業主」類別受訪者只有四位，數量不足，且都是彰化縣的老闆，有地域性的限制。第三，本研究沒有進行更深度的田野調查，無法更進一步得知這企業老闆與政治人物的日常關係，有些較為敏感的資訊無法透過一次深度訪談即得知。另外，本文也沒有進行嚴謹的生命史口述調查。第四，仍有許多黨外雜誌、政論文選透露出當年政治人物對於中小企業的看法，後續研究可以比對這些看法、與其後續的實際行為。

最後，仍有一部分非常重要的因素本研究沒有處理到：威權政府對中小企業監控的問題。本研究僅能從現有口述資料推測部分中小企業在 1985 年以後沒有遭到直接的騷擾，但是直到官方文件出土之前，我們都不能確定 1992 年警總裁撤以前，政府對於這群人有沒有監控？監控的程度為何？這個問題有待後續文件出土，或是能夠訪談到當年執行監控的當事者以解此惑。

研究展望方面，台灣民主轉型的故事仍有許多感人情節尚待發掘，而我們的時間所剩不多了，本研究 17 位受訪者的平均年齡為 70 歲，參與者正在急速凋零中。希冀後續更精彩的研究發掘。

第四節 結論

回到最初的問題意識，我們成功地把台灣經濟的故事與政治的故事一起說了嗎？我們釐清了迷霧中的中小企業與民主運動的關係了嗎？我們有更了解民進黨了嗎？

政治的故事，本文呈現的依然是「英雄的故事」，但是這些英雄在本文不再那麼英明神武了。他們也是要考慮「帳本有沒有透支」問題的凡人，跟他們談錢總是有那麼一點市儈了，但是沒有金錢的支撐，英雄還能是英雄嗎？用錢當然不能打倒威權，但是打倒威權不能只靠激情。

經濟的故事，本文呈現的不再是一群「沒沒無聞」、「頂真打拚」的中小企業主，而是一群對於政治理想很熱血、對於事業很打拚，有血有肉的「頭

家」。他們有的躲藏在人群中，偷偷塞一大包鈔票在哪位「民主先鋒」身上。有的頭家聽演講聽得太激情，把身上所有錢包括硬幣都丟到宣傳車上，卻發現自己忘了留回家的車錢。這些台灣人的群象終於浮現，但是還不夠、還不夠，台灣應該還有成千上萬個這種故事等待你我發掘。

我們有弄懂政商關係了嗎？我們有更懂民進黨了嗎？至少我們開了個頭了，我們知道所謂骯髒的「政商關係」的源頭其實是那麼的純粹、那麼的熱血。我們還是不懂民進黨，但是沒關係，因為故事還沒說完，還需要你我一起寫故事、一起說故事。

參考文獻



壹、西文部分

專書

- Aldrich, J. 1995. *Why parties? : the origin and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Americ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vans, P. 1995. *Embedded autonomy :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reene, J. Megan. 2008. *The Origins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Taiw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ggard, S. 1990. *Pathways from the periphery : the politics of growth in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siao, H. M. 1993. *Discovery of the Middle Classes in East Asia*.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Hsiao, H. M. 1999. *East Asian Middle Class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Hsiao, H. M. 2006. *Asian New Democracies: The Philippines, South Korea and Taiwan Compared*. Taipei: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 Huntington, S. 1991. *The third wave :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Inglehart, R. 1977.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acobs, J. B. 2008. *Local Politics in Rural Taiwan under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Connecticut: EastBridge.
- Johnson, Chalmers. 1982.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pset S. M. 1960.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New York: Doubleday.
- Moore, B. 1993.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 O'Donnell, G., Schmitter, P., and Whitehead, L. 1986.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Przeworski A., Alvarez M., Cheibub J., and Limongi F. 2000.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hieh, G. 1992. "Boss" Island: *The Subcontracting Network and Micro-Entrepreneurship in Taiwan's Development*. New York: Peter Lang.
- Wade, R. 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專書論文

- Field, Karl James. 2002 "KMT Inc: liberaliza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politics in business." In *Political Business in East Asia*, ed. Edmund Gomez. New York: Routledge, 115-154.

期刊論文

- Boix C, & Stokes S. 2003. "Endogenous democratization." *World Politics* 55(4): 517-549.
- Cheng, T. 1989. "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inist Regime in Taiwan." *World Politics* 41(4): 471-499.
- Cheng, T. 2001. "Transformation Taiwan's Economic Structure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Quarterly* 165(March): 19-36.
- Foa, R. S. 2018. "Modernization and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3: 129-140.
- Haggard, S., and Kaufman, R. R. 2016. "Democratization during the third wav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9: 125-144.
- Hamilton, G. G., and Kao, C. S. 1987. "Max Weber and the analysis of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3): 289-300.
- Lipset S. M. 1959.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 :69-105.

貳、中文部分

第一手研究資料

-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P1，台北市中山區，2019 年 08 月 04 日。
-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P2，台北市中山區，2019 年 08 月 06 日。
-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P3，彰化縣員林市，2019 年 08 月 09 日。
- 作者訪談、P4 配偶陪訪，訪談紀錄 P4，台北市松山區，2019 年 08 月 08 日。
-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P5，台北市大安區，2019 年 08 月 19 日。
- 作者訪談，訪談編號 P6，台北市信義區，2019 年 08 月 20 日。
- 作者訪談、陳翠蓮陪訪，訪談紀錄 P7，台北市中正區，2019 年 08 月 30 日。
-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P8，高雄市鼓山區，2019 年 08 月 31 日。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P9，新北市新店區，2019 年 09 月 11 日。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P10，台北市中正區，2019 年 09 月 16 日。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P11，台北市中正區，2019 年 09 月 18 日。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S1，彰化縣彰化市，2019 年 08 月 16 日。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S2，彰化縣員林市，2019 年 08 月 26 日。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S3，彰化縣彰化市，2019 年 08 月 29 日。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S4，彰化縣花壇鄉，2019 年 08 月 29 日。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M1，台北市大安區，2019 年 09 月 16 日。
作者訪談，訪談紀錄 M2，台北市大安區，2019 年 09 月 22 日。
S2 提供，受訪者 S2 口述，2019，《S2 董事長口述歷史》電子檔，未公開。



史料、資料庫、傳記、回憶錄、訪談錄

艾琳達，1997，《激盪！台灣反對運動總批判》，台北市：前衛。
吳三連口述，吳豐山撰述，1991，《吳三連回憶錄》，台北：自立晚報。
周琇環、陳世宏編註，2000，《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二）組黨運動》，台北縣新店市：國史館。
康寧祥口述、陳清喜撰述，2013，《台灣，打拼：康寧祥回憶錄》，臺北市：允晨文化。
張文隆著，王能祥策畫，2013，《台灣民主之父：郭雨新評傳》，新北市：遠景出版。
張炎憲主編，2008，《民主崛起：1980's 臺灣民主化運動訪談錄 1、2 冊》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
陳儀深訪問，林志晟、彭孟濤、簡佳慧、嚴婉玲撰述，2013，《從建黨到執政：民進黨相關人物訪問紀錄》，臺北：玉山社。
慈林教育基金會、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2008，《慈林教育基金會典藏臺灣社運史料資料庫》<http://chilin.lib.ntu.edu.tw/RetrieveDocs.php>
新臺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總策劃，1999，《沒有黨名的黨：美麗島政團的發展》，台北：時報文化。

學術專書

王振寰，1996，《誰統治台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台北：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王振寰，2010，《追趕的極限：臺灣的經濟轉型與創新》，台北：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包澹寧，1995，《筆桿裡出民主：論新聞媒介對台灣民主化的貢獻》，李連江譯，台北：時報。譯自 Berman, D. 1992. *Words like colored glass: the role of the press in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周添城、林志誠，1999，《台灣中小企業的發展機制》，臺北市：聯經。

- 胡慧玲，2013，《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 卷三 民主的浪潮》，新北市：衛城出版。
- 若林正文，2014，《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洪郁如、陳培豐譯，臺北市：臺灣大學出版中心。譯自若林正文，2008《台湾の政治—中華民國台湾化の戦後史》，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 高承恕，1999，《頭家娘—台灣中小企業『頭家娘』的經濟活動與社會意義》，台北：聯經。
- 陳介玄，1994，《協力網絡與生活結構：臺灣中小企業的社會經濟分析》，臺北市：聯經。
- 陳明通，1995，《派系政治與臺灣政治變遷》，臺北市：月旦。
- 陳東升，1995，《金權城市：地方派系、財團與臺北都會發展的社會分析》，台北市：巨流圖書公司
- 陳師孟等，1997，《解構黨國資本主義：論台灣官營事業之民營化》，台北市：自立晚報社。
- 陳翠蓮，2013，《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 卷一 自治的夢想》，新北市：衛城出版。
- 劉進慶，1992，《台灣戰後經濟分析》，王宏仁，林繼文，李明俊譯，臺北市：人間出版。譯自《戰後台湾經濟分析：1945年から1965年まで》，1975。
- 謝國興，1999，《台南幫：一個台灣本土企業集團的興起》，台北：遠流。
- 瞿宛文，2017，《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起源：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台北：中央研究院。
- 龔宜君，1998，《外來政權與本土社會：改造後國民黨政權社會基礎的形成(1950-1969)》，臺北縣板橋市：稻鄉。

專書論文

- 王振寰、李宗榮、陳琮淵，2017，〈台灣經濟發展中的國家角色：歷史回顧與理論展望〉，李宗榮、林宗弘主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49-88，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朱雲漢，1989，〈寡占經濟與威權政治體制〉，臺灣研究基金會主編，《壟斷與剝削：威權主義的政治經濟分析》：139-160，台北市：臺灣研究基金會。
- 朱雲漢，1998，〈從黨國體制到支配性一黨體制〉，陳明通、鄭永年主編，《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261-286，台北：月旦出版社。
- 吳乃德，2013，〈導言：我們共同的故事〉，吳乃德、胡慧玲、陳翠蓮，《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8-12，新北市：衛城出版。
- 吳乃德、林佳龍，1989，〈中產階級與民主改革：現實或神話？—重構中產階級和民主化的關係〉，蕭新煌主編，《變遷中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217-232，台北市：巨流圖書公司。

- 周添城，1989，〈權力邊陲的中小企業〉，臺灣研究基金會主編，《壟斷與剝削：威權主義的政治經濟分析》：97-118，台北市：臺灣研究基金會。
- 林佳龍，1998，〈臺灣地方選舉與國民黨的市場化〉，陳明通、鄭永年主編，《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169-260，台北：月旦出版社。
- 胡克威，2001，〈台灣民主化階段中階級背景與投票行為關係的探討〉，劉兆佳、尹寶珊、李明堃、黃紹倫主編，《市場、階級與政治：變遷中的華人社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陳明通、林繼文，1998，〈臺灣地方選舉的起源與國家社會關係轉變〉，陳明通、鄭永年主編，《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23-70，台北：月旦出版社。
- 陶儀芬、張珈健，2008，〈政商關係在民主化之後的發展—以金融自由化為例〉，王宏仁、李廣均、龔宜君主編，《跨戒：流動與堅持的台灣社會》：219-238，台北：群學出版社。

期刊論文

- 王甫昌，2008，〈族群政治議題在台灣民主轉型中的角色〉，《臺灣民主季刊》，5（2）：89-140。
- 何明修，2000，《民主轉型過程中的國家與民間社會：以台灣的環境運動為例（1986-1998）》，台北市：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吳乃德，2000，〈人的精神理念在歷史變革中的作用：美麗島事件和台灣民主化〉，《台灣政治學刊》，4：57-104。
- 吳介民，2002，〈解除克勞塞維茲的魔咒：分析台灣當前社會改革運動的困境〉，《台灣社會學》，4：159-198。
- 吳泉源，1993，〈金融自由化的迷失：一個經濟社會學的考察〉，《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5：1-37。
- 張鐵志，2008，《資本主義發展與民主化：台灣新政商聯盟與國民黨政權維繫》，台北市：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信傑，1999，〈民主進步黨的創黨過程：外省菁英分子所扮演的角色〉，台北市：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宗昊，2013，〈陳水扁時期的台灣政商關係—少數政府、個人化網路與金融改革〉，《臺灣民主季刊》，10（3）：41-90。
- 葉晉嘉，2012，〈臺灣城鄉後物質價值觀的差異與變遷〉，《調查研究》，27，52-79。
- 謝國雄，1989，〈外包制度：比較歷史的回顧〉，《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29-69。
- 謝國雄，1989，〈黑手變頭家：台灣製造業中的階級流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11-54。
- 謝國雄，1991，〈網絡式勞動過程：台灣外銷工業中的外包制度〉，《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1：161-182。

謝國雄，1992，〈隱形工廠：台灣的外包點與家庭代工〉，《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3：137-190。

謝國雄，1993，〈事頭、頭家與立業基之活化：台灣小型製造業單位創立及存活過程之研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5：93-129。



學位論文

何孟樺，2016，《台灣民主化與沒有歷史的人》，新竹市：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蕭亞譚，2009，《台灣中產階級組織及其對階級文化形成的影響－以台北市扶輪社為例》，台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論文。

附錄：訪談大綱



P1 訪談大綱

1. 老師曾經在著作中提到民主運動的目標是「解除管制」，而且主要是對政治的管制。請問您認為當時民間／工商界有對於經濟「解除管制」的要求嗎？如果有，民主運動有成功結合民間力量解除對於經濟與政治的管制嗎？
 2. 您在著作中也認為 1980 年代的民主運動並無法成功解除政治管制，而是 1990 年代才實現自由化、民主化。請問您認為為什麼 1980 年代的運動無法突破？
 3. 您認為中小企業有對黨外／民進黨比較支持嗎？您認為為什麼？
 4. 1994 年陳定南選舉省長、1996 年彭明敏選舉總統，您發明「選舉紀念券」籌措競選經費，以您選舉操盤的經驗，民進黨當年選舉的經費是哪種人的捐款最多、最重要？
 5. 以您自己歷次選舉的經驗（國大、立委、縣長），您自己的競選經費大多是如何籌措？有年代或地方的差別嗎？
 6. 在您印象中，當年有哪位企業老闆特別支持您或民進黨的嗎？
 7. 如果有，企業老闆的捐助大概佔您選舉花費的多少？
- 史料蒐集
1. 請問您還留有當年選舉時的帳本嗎？
 2. 請問您有推薦我去拜訪哪位政治人物或企業主嗎？

P2 訪談大綱



1. 可以跟我分享您自己親身參與 1980 年代民主運動/選舉的經驗嗎？您覺得 1980 年代黨外/民進黨的選舉跟 1990 年代的選舉有什麼差別？
 2. 我的研究是想知道當年政府高壓下的民主運動是如何突破的，而我的切入點是認為有一部份原因來自於廣大中小企業的資源支持。請問您同意或不同意這個看法嗎？為什麼？
 3. 如果中小企業有比較支持黨外/民進黨，您認為動機是什麼呢？（理念支持？政策利多？人際關係？）
 4. 如果中小企業有比較支持黨外/民進黨，是中小企業需要民主運動，還是民主運動需要中小企業？
 5. 從您接觸黨外到 2000 年政黨輪替前，以您自己歷次輔選的經驗，您的陣營的競選經費大多是如何籌措？有年代或地方的差別嗎？
 6. 在您印象中，當年有哪位企業老闆特別支持黨外或民進黨的嗎？
 7. 如果有，企業老闆的捐助大概佔競選經費的多少？
- 其他
1. 請問您還留有當年選舉時的帳本嗎？
 2. 請問您有推薦我去拜訪哪位政治人物或企業主嗎？

P3 訪談大綱



● 中小企業與民主運動

1. 我的研究是想知道當年民主運動的背後資源來自何方？閱讀過「民主台灣的彰化推手」之後，我猜想有一部份原因來自於廣大中小企業的資源支持，民主運動才有實際的資源得以對抗威權。請問您同意或不同意這個看法嗎？為什麼？
2. 如果中小企業有比較支持黨外/民進黨，您認為動機是什麼呢？（理念支持？政策利多？人際關係？）
3. 如果中小企業有比較支持黨外/民進黨，是中小企業需要民主運動，還是民主運動需要中小企業？
4. 承上題，是民主運動先發現中小企業主的「民氣可用」，而有計畫的去動員他們；還是中小企業主先發現必須要靠黨外去衝撞，因而先給黨外運動幫助呢？
5. 如果中小企業的崛起跟民主運動的崛起是結合在一起的，可不可以請您舉個實例，是哪些政治人物、在那些選舉之中，其實有很多中小企業給予支持？這些政治人物是誰？而企業主又是誰？
6. 每個政治人物選舉動員的方式都很不一樣，就你所知哪個政治人物很依靠中小企業的支持呢？而哪些又比較不依靠？有派系的差別、或是地區的差別、或是年代的差別嗎？
7. 這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為什麼當年企業老闆不去找已經很有政治實力的國民黨候選人幫忙呢？而且當年應該也有很多國民黨人嗅到本土化的政治氣息，支持本土中小企業應該不奇怪？想請問您的看法。
8. 在您印象中，當年有哪位企業老闆特別支持黨外民主運動的嗎？

● 其他

1. 請問您有推薦我去拜訪哪位政治人物或企業主嗎？

P4 訪談大綱



● 中小企業與黨外金援

1. 您認為中小企業有對黨外比較支持嗎？您認為為什麼他們會去支持黨外？
2. 以您自己歷次立委選舉的經驗，您的競選經費大多是如何籌措？有年代的差別嗎？例如，組黨後，選舉時的競選經費會更簡單或更難籌措嗎？
3. 在許多人的回憶錄都提到黃信介先生非常慷慨，常常自掏腰包「救濟」黨外同志選舉。當年您在選舉時，有沒有這樣的人擔任黃信介先生這樣的角色的？
4. 您曾經辦過黨外雜誌「XX 雜誌」，我很好奇當年黨外雜誌的資金是如何籌措？
5. 在您印象中，當年有哪位企業老闆特別支持您的嗎？無論是對於黨外雜誌、選舉後援會、或是對您自己選舉的資助。
6. 如果有，請問他（們）約捐助您多少錢？
7. 如果有，企業老闆的捐助大概佔您選舉花費的多少？

● 史料蒐集

3. 請問您還留有當年選舉時的帳本嗎？
4. 請問您還留有當年黨外雜誌的內部文件嗎（訂戶名單、帳本等）？

P5 訪談大綱



● 黨外雜誌與民主運動的經濟生活

1. 我的研究初衷是想尋找 1980 年代民主運動的資源來源，因為民主運動無論選舉、組織、發行黨外雜誌都要經費，那麼這些資源是怎麼得到的？您的看法是？
2. 當年您曾經在《八十年代》、《深耕》、《前進》等黨外雜誌工作過，就您的經驗來說，剛創刊時出資的都是誰？這些雜誌的經營狀況如何？
3. 您認為黨外雜誌有提供到民主運動的實際資金來源（盈餘）嗎？還是黨外雜誌時常入不敷出，需要靠理念在撐（誰在出錢幫忙撐）？

● 中小企業與民主運動

1. 我的研究是想知道當年民主運動的背後動力來自何方？而我的切入點是認為有一部份原因來自於廣大中小企業的資源支持，民主運動才有實際的資源得以對抗威權。請問您同意或不同意這個看法嗎？為什麼？
2. 如果中小企業有比較支持黨外/民進黨，您認為動機是什麼呢？（理念支持？政策利多？人際關係？）
3. 如果中小企業有比較支持黨外/民進黨，是中小企業需要民主運動，還是民主運動需要中小企業？
4. 承上題，是民主運動先發現中小企業主的「民氣可用」，而有計畫的去動員他們；還是中小企業主先發現必須要靠黨外去衝撞，因而先給黨外運動幫助呢？
5. 如果中小企業的崛起跟民主運動的崛起是結合在一起的，可不可以請您舉個實例，是哪些政治人物、在那些選舉之中，其實有很多中小企業給予支持？這些政治人物是誰？而企業主又是誰？
6. 每個政治人物選舉動員的方式都很不一樣，就你所知哪個政治人物很依靠中小企業的支持呢？而哪些又比較不依靠？有派系的差別、或是地區的差別、或是年代的差別嗎？
7. 這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為什麼當年企業老闆不去找已經很有政治實力的國民黨候選人幫忙呢？而且當年應該也有很多國民黨人嗅到本土化的政治氣息，支持本土中小企業應該業不奇怪？想請問您的看法。
8. 在您印象中，當年有哪位企業老闆特別支持黨外民主運動的嗎？

● 其他

1. 請問您有推薦我去拜訪哪位政治人物或企業主嗎？

P6 訪談大綱



- 中小企業與黨外金援
- 2. 我的研究是想知道當年民主運動的背後動力來自何方？而我的切入點是認為有一部份原因來自於廣大中小企業的資源支持，民主運動才有實際的資源得以對抗威權。請問您同意或不同意這個看法嗎？為什麼？
- 3. 如果中小企業有比較支持黨外/民進黨，您認為動機是什麼呢？（理念支持？政策利多？人際關係？）
- 4. 您當年幫 XXX 先生助選立委（1975）時，當年 X 先生在選舉時的經費是怎麼來的？
- 5. 您 1977 年幫 XXX 先生助選時，您主要的角色是什麼？您知道當年 XXX 的競選經費是怎麼籌措的嗎？
- 6. 關於 1981 年您第一次參與省議員選舉，您的競選經費是怎麼籌措的？當年有沒有特別支持你的小頭家？
- 7. 您在 1983 年是「1983 黨外選舉後援會」的 XX 長，我很好奇當年黨外組織化的工作需要經費嗎？後援會的資源是哪裡來的？
- 8. 1985 年您競選連任省議員，競選經費與上次 1981 年的相比如何？
- 9. 您清楚 1986 年民進黨組黨後初期的財務狀況如何嗎？
- 10. 組黨後，選舉時的競選經費會更簡單或更難籌措嗎？
- 11. 在您印象中，當年有哪位企業老闆特別支持您的嗎？無論是對於黨外的組織例如選舉後援會、公政會、或是對您自己選舉的資助。

P7 訪談大綱



● 中小企業與黨外金援

1. 您認為中小企業有對黨外比較支持嗎？您認為為什麼他們會去支持黨外？
2. 以您自己歷次選舉的經驗，您的競選經費大多是如何籌措？有時代的差別嗎？
3. 在許多人的回憶錄都提到黃信介先生非常慷慨，常常自掏腰包「救濟」同志選舉。當年您在選舉時，有沒有這樣的人擔任信介仙這樣的角色的？
4. 您與 XXX 先生在 1977 年五項公職選舉時組成全台灣的黨外助選團，我很好奇當年黨外組織化的工作需要經費嗎？後援會的資源是哪裡來的？
5. 美麗島事件後，例如 1980 的中央民代選舉「黨外候選人聯誼會」推薦「真黨外」、1981 的五項公職選舉的「推薦人團」這些組織工作的經費又是怎麼籌措的呢？
6. 您清楚 1986 年民進黨組黨後初期的財務狀況如何嗎？
7. 組黨後，選舉時的競選經費會更簡單或更難籌措嗎？
8. 在您印象中，當年有哪位企業老闆特別支持您的嗎？無論是對於黨外的組織例如選舉後援會、公政會、或是對您自己選舉的資助。
9. 如果有，請問他（們）約捐助您多少錢？
10. 如果有，企業老闆的捐助大概佔您選舉花費的多少？

● 史料蒐集

1. 請問您還留有當年選舉時的帳本嗎？
2. 請問您還留有當年後援會／公政會時期的內部文件嗎？

P8 訪談大綱



● 中小企業與民主運動

1. 我的研究是想知道當年民主運動的背後動力來自何方？而我的切入點是認為有一部份原因來自於廣大中小企業的資源支持，民主運動才有實際的資源得以對抗威權。請問您同意或不同意這個看法嗎？為什麼？
2. 您從 1981 年選舉 XXX 議員踏入政壇、到 1985 選 XXX、1989、1992XX 選舉、1994、1998XXX 選舉、2000 總選舉政黨輪替為止，共參與了 7 次選舉。您可以先跟我談談解嚴前 2 次參選的經驗，當時的選舉是如何突破國民黨的威權統治，讓民眾的熱情轉化為實質的支持？
3. 解嚴後、民進黨組黨後的歷次選舉直到政黨輪替前，我們可以看到民進黨的選舉後援會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可以跟我談談您當年選立委、市長、總統的經驗，是如何突破擁有黨產、又黑金橫行的國民黨的銀彈攻勢，創造屬於民主運動的支持網絡？
4. 您在 2000 年選總統時就有組織「中小企業後援會」，請問您是什麼時候發現中小企業的「民氣可用」，而有計畫的去動員他們；還是中小企業發現必須要靠民進黨/黨外去衝撞，因而給民主運動幫助呢？
5. 如果中小企業有比較支持黨外/民進黨，您認為動機是什麼呢？（理念支持？政策利多？人際關係？）
6. 您認為在對抗國民黨的民主運動過程中，是中小企業需要民主運動，還是民主運動需要中小企業？
7. 這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為什麼當年企業老闆不去找已經很有政治實力的國民黨候選人幫忙呢？而且當年應該也有很多國民黨人嗅到本土化的政治氣息，支持本土中小企業應該業不奇怪？想請問您的看法。

● 黨外雜誌與民主運動的經濟生活

1. 當年您創辦黨外雜誌《XXX》，創刊時出資的都是誰？雜誌的經營狀況如何？
2. 您認為黨外雜誌有提供到民主運動的實際資金來源（盈餘）嗎？還是黨外雜誌時常入不敷出，需要靠理念在撐（誰在出錢幫忙撐）？

P9 訪談大綱



● 中小企業與民主運動

1. 我的研究是想知道當年民主運動的背後動力來自何方？而我的切入點是認為有一部份原因來自於廣大中小企業的資源支持，民主運動才有實際的資源得以對抗威權。請問您同意或不同意這個看法嗎？為什麼？
2. 如果中小企業有比較支持黨外/民進黨，您認為動機是什麼呢？（理念支持？政策利多？人際關係？）
3. 您認為是民主運動先發現中小企業主的「民氣可用」，而有計畫的去動員他們；還是中小企業主先發現必須要靠黨外去衝撞，因而先給黨外運動幫助呢？
4. 如果中小企業的崛起跟民主運動的崛起是結合在一起的，可不可以請您舉個實例，是哪些政治人物、在那些選舉之中，其實有很多中小企業給予支持？這些政治人物是誰？而企業主又是誰？
5. 每個政治人物選舉動員的方式都很不一樣，就你所知哪個政治人物很依靠中小企業的支持呢？而哪些又比較不依靠？有派系的差別、或是地區的差別、或是年代的差別嗎？
6. 您在黨外時期曾經參與黨外編聯會的運作，我們知道當年公政會可以有公職分攤的經費，那編聯會當年的經費要怎麼處理？編聯會會不會因為資源不足而向公職人員求援？
7. 您當年曾參與勞支會、台權會等社運團體，這些解嚴前後的社運團體是靠什麼募款？黨外政治人物會給予支持嗎？
8. 社會運動不只要動員人，資源動員也很重要，可以請你分享 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台灣社運資源動員的經驗嗎？

● 黨外雜誌與民主運動的經濟生活

1. 我的研究初衷是想尋找 1980 年代民主運動的資源來源，因為民主運動無論選舉、組織、發行黨外雜誌都要經費，那麼這些資源是怎麼得到的？您的看法是？
2. 當年您曾經在《八十年代》、《新潮流》等黨外雜誌工作過，就您的經驗來說，剛創刊時出資的都是誰？這些雜誌的經營狀況如何？
3. 您認為黨外雜誌有提供到民主運動的實際資金來源（盈餘）嗎？還是黨外雜誌時常入不敷出，需要靠理念在撐（誰在出錢幫忙撐）？

P10 訪談大綱



● 中小企業與民主運動

1. 您從黨外時期民主運動，一直到後來為民進黨開疆闢土、連選皆捷，對於當年民主運動的經驗十分豐富。我的研究想要了解的是民主運動哪裡來的資源得以對抗威權？您覺得對於民主運動最重要的經濟支援是來自哪裡呢？
 2. 1970、80 年代是台灣經濟起飛、高速成長的年代。同時興起了兩股重要的力量，其一是政治上的黨外民主運動、其二是經濟上的廣大中小企業。您認為這兩股力量有沒有相互結合？如果有，那麼您認為中小企業比較支持黨外/民進黨的動機是什麼呢？（理念支持？政策利多？人際關係？）
 3. 您認為是民主運動先發現中小企業主的「民氣可用」，而有計畫的去動員他們；還是中小企業主先發現必須要靠黨外去衝撞，因而先給黨外運動幫助呢？
 4. 您自己參選過 XXX 國代、XX 市、XX 市、XX 市立委，以您征戰南北的經驗來看，那些地區比較依靠中小企業的支持？有派系的差別、或是年代的差別嗎？
 5. 我們都知道當年國民黨擁有黨產、黑金橫行，到選舉時，黨外/民進黨的資源少得可憐。想請問以您自己參選多次的經驗，您當年的競選經費都怎麼籌措？是如何創造屬於民主運動/民進黨的支持網絡，以對抗國民黨的銀彈攻勢？
 6. 您在黨外時期曾經參與黨外編聯會的運作，我們知道當年公政會可以有公職分攤的經費，那編聯會當年的經費要怎麼處理？編聯會會不會因為資源不足而向公職人員求援？
 7. 編聯會在組黨後主要是成為後來的新潮流，想請問您，在組黨初期資源匱乏的時代，民進黨是怎麼挺過來的？新潮流在當時扮演什麼角色？
 8. 組黨後、一直到 1990 年代，新潮流在當時的民進黨內算是新生代的一群，相較於已經有公職的其他派系、政治人物是相對沒有資源的一群人。想請問您，當年新潮流是如何從一個理念型的幹部組織、成為到現在深耕地方、基層組織完整的團體？
- ## ● 黨外雜誌與民主運動的經濟生活
1. 當年您曾經參與《新潮流》黨外雜誌，請問您當年在新潮流的角色是什麼？剛創刊時出資的都是誰？就您的經驗來說，雜誌的經營狀況如何？
 2. 您認為黨外雜誌有提供到民主運動的實際資金來源（盈餘）嗎？還是黨外雜誌時常入不敷出，需要靠理念在撐（誰在出錢幫忙撐）？

P11 訪談大綱



1. 您在美麗島事件受難之前，曾經與蘇貞昌院長都參與台北青商會的運作，可以請您說說看當年青商會與民與主運動的關聯嗎？
2. 您是台灣第一個引進法律服務的先行者，創辦「平民法律服務中心」，想請問您當時這個中心是如何維持日常開銷？比較法學會有提供資助嗎？
3. 您著作等身，戒嚴時期即已出版了《XXXX》《XXXX》等多本政論書籍，想請問您當時要出版書籍的成本要如何籌措？如果被查禁是否就血本無歸？
4. 談到選舉，您曾在解嚴前 1978 年參與過國代選舉，也於解嚴後、您出獄後的 1992、1995、1998 三度參與選舉。可以請您分享您這幾次參選經驗的差別嗎？解嚴前後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5. 1970、80 年代是台灣經濟起飛、高速成長的年代。同時興起了兩股重要的力量，其一是政治上的黨外民主運動、其二是經濟上的廣大中小企業。在您參選的彰化縣，恰巧是台灣中小企業的基地，請問就您幾次參選的經驗，您認為民主運動與中小企業有沒有相互結合？
6. 如果有，那麼您認為中小企業比較支持黨外/民進黨的動機是什麼呢？（理念支持？政策利多？人際關係？）
7. 您擔任民進黨第 X 任主席，當時創黨維辛財務並不穩定，請問當時是怎麼挺過來的？

S1 訪談大綱



● 早年經歷與公司經營

1. 可以跟我聊聊您 1985 年上台北經商前，一面在工廠工作、一面參與地方政治的經驗嗎？例如 1979 年的美麗島事件，對你有沒有影像？
2. 1985 年以後您北上經商，是什麼契機讓您決定要北上創業？
3. 可以跟我簡介您的公司嗎？為何會選擇航運業？
4. 您的公司經營理念是什麼？
5. 當時有誰投資你嗎？公司一開始創立的資金來源是靠哪裡？有上市嗎？
6. 你當時長期支持黨外，國民黨政府會不會去你的公司騷擾？怎麼騷擾（查稅、融資）？如果不會，你是怎麼讓國民黨「不知道」你支持民主運動？
7. 公司的客戶不會因為你反對國民黨而減少嗎？有遭到其他同業的排擠嗎？
8. 您長期支持民主運動，家人、同事會反對嗎？（例如零用錢變少之類）
9. 公司經營過程中，遭遇最大危機是什麼？
10. 您認為普遍來說，中小企業有比較支持黨外/民進黨嗎？
11. 中小企業受到的騷擾、排擠會讓他們普遍支持黨外/民進黨嗎？

● 投入民主運動

1. 您以前看黨外雜誌嗎？最喜歡／最有印象是哪本雜誌？
2. 在《民主台灣的彰化推手》裡面提到您曾幫忙謝聰敏競選立委，請問當時您是有什麼契機支持謝委員？
3. 除了謝委員的兩次立委選舉，您還有幫助誰過嗎？例如 1994 年陳定南選省長、1996 年彭明敏選總統、1999 阿扁選總統？
4. 您曾創辦「大彰化之聲」地下電台，當時創辦的契機是什麼？會不會被國民黨干擾（蓋台）？

S2 訪談大綱



● 投入民主運動

1. 您以前看黨外雜誌嗎？最喜歡／最有印象是哪本雜誌？
2. 您接觸到黨外民主運動的契機是什麼？
3. 您還記得當時幫助過誰選舉、或是幫助過哪場街頭運動？可以跟我分享經驗嗎？

● 民主運動與公司經營

1. 可以跟我簡介您的公司嗎？
2. 可以跟我聊聊您創業的經驗與契機嗎，當時為何會投入這個產業？
3. 你長期支持黨外民主運動，國民黨政府會不會去你的公司騷擾？怎麼騷擾（查稅、融資）？如果不會，你是怎麼讓國民黨「不知道」你支持民主運動？
4. 公司的客戶不會因為你反對國民黨而減少嗎？有遭到其他同業的排擠嗎？
5. 您長期支持民主運動，家人、同事會反對嗎？（例如零用錢變少之類）
6. 您認為普遍來說，中小企業有比較支持黨外/民進黨嗎？
7. 您認為就您在工商界奮鬥多年的經驗，在 1970、1980 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國民黨政府的角色重要嗎？他是經濟發展的領頭羊，還是經濟發展的阻礙？
8. 中小企業受到的騷擾、排擠會讓他們普遍支持黨外/民進黨嗎？

S3 訪談大綱



● 投入民主運動

1. 以前台灣人因為二二八事件，對政治冷漠，怕「摻政治」會招來殺身之禍。您接觸到黨外民主運動的契機是什麼？
2. 您還記得當時幫助過誰選舉、或是幫助過哪場街頭運動？可以跟我分享經驗嗎？

● 民主運動與公司經營

1. 可以跟我簡介您的公司嗎？
2. 可以跟我聊聊您父親的工廠，當時他為何會投入這個產業？您何時接班？
3. 你長期支持黨外民主運動，國民黨政府會不會去你的公司騷擾？怎麼騷擾（查稅、融資）？如果不會，你是怎麼讓國民黨「不知道」你支持民主運動？
4. 公司的客戶不會因為你反對國民黨而減少嗎？有遭到其他同業的排擠嗎？
5. 您長期支持民主運動，家人、同事會反對嗎？（例如零用錢變少之類）
6. 您認為普遍來說，中小企業有比較支持黨外/民進黨嗎？
7. 您認為就您在工商界奮鬥多年的經驗，在 1970、1980 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國民黨政府的角色重要嗎？他是經濟發展的領頭羊，還是經濟發展的阻礙？
8. 中小企業受到的騷擾、排擠會讓他們普遍支持黨外/民進黨嗎？

S4 訪談大綱



● 投入民主運動

1. 您之前有跟我分享您當兵在做國民黨軍隊保防工作的故事，您可以跟我分享您在當兵與退伍之後的想法改變嗎？
2. 您還記得當時幫助過誰選舉、或是幫助過哪場街頭運動？可以跟我分享經驗嗎？

● 民主運動與公司經營

1. 可以跟我簡介您的公司嗎？
2. 可以跟我聊聊您父親的工廠，當時他為何會投入這個產業？您何時接班？
3. 你長期支持黨外民主運動，國民黨政府會不會去你的公司騷擾？怎麼騷擾（查稅、融資）？如果不會，你是怎麼讓國民黨「不知道」你支持民主運動？
4. 公司的客戶不會因為你反對國民黨而減少嗎？有遭到其他同業的排擠嗎？
5. 您長期支持民主運動，家人、同事會反對嗎？（例如零用錢變少之類）
6. 您認為普遍來說，中小企業有比較支持黨外/民進黨嗎？
7. 您認為就您在工商界奮鬥多年的經驗，在 1970、1980 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國民黨政府的角色重要嗎？他是經濟發展的領頭羊，還是經濟發展的阻礙？
8. 中小企業受到的騷擾、排擠會讓他們普遍支持黨外/民進黨嗎？

M1 訪談大綱



1. 1980 年代初期是黨外雜誌風起雲湧的年代，您當年剛好有經歷這段時期。我很好奇當年黨外雜誌從作者的稿紙起，經過哪些程序、那些波折才成為讀者手中的黨外雜誌？就是當年黨外的一整套產銷過程是什麼？而您自己是經手哪一段？
2. 當年您曾經手過多家黨外雜誌，就您的經驗來說，這些雜誌的經營狀況如何？那些黨外雜誌（系列）銷路最好？
3. 您覺得黨外雜誌的營收有可能反過來支持民主運動嗎？還是雜誌是靠理念在苦撐，並無法永續經營？
4. 當雜誌被查扣/查禁時怎麼辦？會不會損失慘重而關門大吉？
5. 您經歷過那個禁聲的年代，當年民主運動是靠一般大眾默默支持，有人出錢、有人出力而發展起來的。請問當年有沒有您接觸過、且對於民主運動盡力幫忙的老闆的故事？有可能是您的同業、或是攝影社、打字行、文具行、印刷、裝訂廠、書商、書店等等的老闆的故事？
6. 我的研究初衷是想尋找 1980 年代民主運動的資源來源，因為民主運動無論選舉、組織、發行黨外雜誌都要經費，那麼這些資源是怎麼得到的？您的看法是？

M2 訪談大綱



1. 1980 年代初期是黨外雜誌風起雲湧的年代，您當年剛好有經歷這段時期。我很好奇當年黨外雜誌從作者的稿紙起，經過哪些程序、那些波折才成為讀者手中的黨外雜誌？就是當年黨外的一整套產銷過程是什麼？而您自己是經手哪一段？
2. 我的研究初衷是想尋找 1980 年代民主運動的資源來源，因為民主運動無論選舉、組織、發行黨外雜誌都要經費，那麼這些資源是怎麼得到的？您的看法是？
3. 當年您曾經在《八十年代》、《新路線》、《關懷》等等多家黨外雜誌工作過，就您的經驗來說，這些雜誌的經營狀況如何？被查扣/查禁時怎麼辦？
4. 之前有看您寫過印刷廠老闆張榮華的故事，讓我非常的有興趣。請問當年還有沒有您接觸過、且對於民主運動盡力幫忙的老闆的故事？有可能是攝影社、打字行、文具行、印刷、裝訂廠、書商、書店等等的老闆的故事？
5. 您在離開民進黨中央黨部之後成立「XX 工作室」，算是台灣第一家政治公關公司，當時有人資助你嗎？有固定的合作廠商嗎？
6. 您投入民主運動的影像紀錄多年，出版了《XXXX》兩冊以及《XXXXXX》，您在紀錄的過程中最不為人知的感動故事是什麼？